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10月31日第26期 总第17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72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四）

目 录

【专 稿】

胡鹏池 但燊 回复蒯大富：四大点与四小点

【评 论】

俞小平 真相的迷雾——答章铎校友

智 晴 毛泽东与《新北大》

陈子明 林 爻 北大文革两派分裂，源自人心向背

——兼与官香政商榷

【述 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一）

——狂潮骤起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六）

——我成了“清队”对象

王复兴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二）

【读者来信】

1. 刘进纠错：魏格林文章中的两处误植

2. 张晓良纠错

3. 北京四中校友致信王复兴，谈其《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一文

【本刊声明】

【专稿】

回复蒯大富：四大点与四小点

胡鹏池 但燊

1968年7月27日上午，蒯大富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神秘失踪了两个多小时？

这是“清华727事件”中的一个“谜”。

48年来，人们并没有发现这里存在一个“谜”。

这个“谜”是本文作者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通过时间排序、逻辑推理，开始怀疑这里可能存在着“猫腻”；继而，有两位热心的清华校友周忠荣与樊程先后提供了那个年代的火车时刻表，经进一步的时间排序，竟然发现727上午蒯大富有两个多小时“神秘失踪”；最终，又通过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与《清华蒯大富》两书的反复比照，所以我们才能推论出：吴德在上午9点多钟在北航找到了蒯大富，10点钟左右吴德在市革委会向蒯大富，宣布了“工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的这个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然而蒯大富在中午12点多回校后却隐瞒了这个重大情节，将工宣队进校定性为“杨余傅的黑后台背着中央搞的阴谋”，并采取了“抵抗还击”的总方针，直接导致了工宣队5死731伤的大惨案。

我们揭开的这个“谜”具有爆炸性。

蒯大富曾有一句颇为著名的话“要讲出历史的真相其实很难”。鉴于我们对蒯大富的了解，我们从一开始起就没有指望他能接受。

蒯大富的第一反应是揶揄：恭喜胡鹏池作出一个惊天发现，他说：48年前，蒯大富撒了个弥天大谎，不仅欺骗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而且欺骗了一万多清华精英。

对此，我们郑重声明，这并不是胡鹏池的个人发现，而是胡鹏池与但燊的共同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更谈不上什么“惊天发现”，蒯大富在“清华

727事件”中说的谎话还多着呢，我们将尽量地一一予以披露。

蒯大富接着说：“胡鹏池做出以上发现的主要根据是吴德的口述回忆。”

这说对了。尽管蒯大富在727上午有两个多小时的“神秘失踪”，但如果没有吴德的这段回忆，我们也不可能想到这一点。

我们还应该坦率承认，吴德的这段回忆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明确注明时间。也许是他疏忽了，也许他认为没有必要。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吴德这段回忆中的每一句话都表明：这件事发生在727上午。

正因为吴德回忆中的缺陷，给蒯大富提供了否认的空间。但如果没有这个“缺陷”呢？蒯大富也会寻找其它的理由与借口进行否认的。因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不仅仅是面对历史的问题，还有如何面对昔日战友的问题，还有他当然不甘心给历史留下一个“谎话大王”的道德形象。

一. 蒯大富发表《答胡鹏池》

胡鹏池于2016年6月下旬在微信上陆续发布了胡、但合写的《727上午，蒯大富去哪儿了？》后，蒯大富于6月27日、7月17日、7月27日分三次发微信《答胡鹏池》。后来，蒯大富将前两篇微信整理成文，以《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的行止去留——关于胡、但编造的“蒯大富7·27上午见了吴德”的海外奇谈》为标题发表在2016年8月15日《记忆》第164期。

该文约1800字，其中大部分是废话，与想要说明的问题并无直接关系，有关系的内容仅只300多字：

“那天一早我和鲍长康去北京站接陈继芳，但没接到，在车站等了一会儿就走了。在路上找了一家饭馆吃了早餐，然后就一起回清华了。-----我回到清华时至多10:30。已看到大批工人进清华。我从西南门进来，后到静斋。马上开了紧急会议，决议两条：(1)

紧急请示中央，问清情况；(2)守住各楼，不让工人进楼。以上过程鲍长康一直在场。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当时工人还未包围静斋，所以我得以顺利进楼。当时开会有鲍，陈育延，任传仲等。”

“下午1:30左右，任传仲带领一伙人冲破了工人包围。我想到市革委去问问情况，就拉着段永基出静斋——如果我在上午就和吴德见过面，已了解情况，怎么会有我再冒险出去找市革委这件事呢。”

我们原来担心的是：

1、火车有没有晚点？要知道文革时期的火车晚点是常见的事。有没有这一列没接到再等下一列？

可是蒯大富明确的说“没接到，在车站等了一会儿就走了”。根本没有“火车晚点”和“再等下一列”的回忆。不仅蒯没有，同行者鲍长康也没有，可见火车既没有晚点，他们也没有再在火车站耽搁时间。

2、有没有其它琐碎事？如汽车在路上有没有抛锚？路上有没有塞车？有没有乘机在城里理个发或洗个澡？有没有什么人跑肚拉稀上医院？

既然这方面的回忆都没有，也就说明了这些都没有发生过。

所以，当我们一看到蒯大富的如上答复时，我们立刻感到我们的推理站住了。

二. 胡鹏池、但粦回复蒯大富：四大点

蒯大富《答胡鹏池》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制造了一个“10:30前回静斋”的新口实，我们断定这是一则“新谎言”。

刑侦常识告诉我们，案件要素有三点：有没有作案时间？有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有没有作案动机。

如果（只是“如果”）将此看作是一件案子的话，吴德无疑是原告，蒯大富是被告。

原告吴德主诉：

被告在市委已经当面承诺“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说一定执行”，回去后却出尔反尔，违背承诺，作出“抵抗还击”的决定。

（派工宣队于7月27日进驻清华，制止武斗）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后，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并且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四五个（应更正为“五个”）进行劝导的工宣队成员，同时还打伤了几个（应更正为“731个”）。

综述以上事实，被告应对此“5死、731伤”的大血案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蒯大富申辩：自己“10：30前回静斋”，没有作案时间，也不可能在作案现场。故此原告方的诉讼主体不成立。

吴德已经死了，但这件历史疑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

表面上看我们是站在吴德的立场上重提旧案，实际上我们的身份仍然是当年的清华学生，如今的“清华文革”的民间研究者。我们重提旧案的目的是厘清历史真相，谁有道理听谁的。

蒯大富究竟是“中午12点多”还是“10：30前回静斋”的确是关键，涉及嫌犯“有没有作案时间”、“在不在案发现场”的重大问题。如果前者成立，那么蒯大富就有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空档；如果后者成立，那么“作案的时间与地点”都不成立，本案就应该立刻撤消。

蒯大富要想证明后者，不能仅凭48年后提供的一面之词，必须对以下四个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第一个问题：《清华蒯大富》第342页已经明确记载“中午12点多，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回到清华。”

①蒯大富可能辩护说：书是韩爱晶写的，我不负责。

我们举出言证与物证说：蒯大富早就多次说过“史实部分，我和韩爱晶共同负责。”

②蒯大富可能辩护说：即使是共同负责，也是疏忽。

我们说：疏忽是可能的，但你们在选择这个时间点时不仅根据回忆，而且对回忆的合理性是曾经经过思考的。

何以见得？

在米鹤都、张琦采写的《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中，蒯大富曾说“回到清华大学快11点了”，可是在成书晚得多的《清华蒯大富》中却将其更改为“中午12点多”。既然存在着“更改”，这就说明了有一个重新回忆、思考、选择的过程，“疏忽”的可能性就小很多了。

第二个问题：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的《清华大学一百年》第292页明确记载“蒯大富中午12时后回校在静斋-----”。

《清华大学一百年》成书时间在《清华蒯大富》之前，它是根据各方面资料综合研究的成果，而且蒯大富自己书中陈述的时间与《清华大学一百年》也是完全一致的。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根据蒯大富现在的证词去改变原有校史的结论。《清华大学一百年》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刊物，具有清华大学官方性质，作为证据，校史记载比蒯大富现在的证言权威得多。

第三个问题：《清华蒯大富》342页说：“十一点半钟，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三支两军办公室负责人刘丰打电话到团派总部找蒯大富。正巧蒯大富到火车站接陈继芳了，刘丰要总部其它人转告蒯大富-----”刘丰打电话的时间与蒯大富回校的时间存在清晰的逻辑关系。蒯现在再三说“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接到刘丰的电话呢？

蒯大富在《答胡鹏池》中辩护说：“刘丰也正在找蒯大富，可惜没找着。刘丰老将军90多岁了，还话着，精神很好。去年我到北京时他还请我吃东来顺涮羊肉。当时刘丰与吴德在市革委会的同一层楼办公。如果吴德正同蒯谈话，刘丰能不知道，还用到处找？”

我们反驳说：请不要将话题扯远了。2015年刘丰请你吃涮羊肉与1968年刘丰打电话有什么关系吗？你的辩护毫无意义，纯粹文不对题，答非所问。

而刘丰打电话的事发生在你刚离开市革委会不久，虽然吴德对你宣布了决定，虽然你也“答应得很好”，但根据你一贯的表现，吴德仍然对你不信任，所以这才与刘丰商量再打一个电话以增加力度。

我们还要告诉蒯大富：“刘丰11点半打电话”这件事不仅在你自己的著作有，校史中有，而且4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质疑。你现在编出“10:30前回静斋”的瞎话，却解释不了你为什么没有接到刘丰的电话。

仅凭这一点，你的“新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第四个问题：在“728召见谈话”中有一段对话：

毛主席：“-----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这是蒯大富在召见现场时毛泽东与吴德的话，请问你听见了吗？如果你认为吴德是当着毛泽东的面说谎，你为何当时不站出来和吴德对证呢？

你不是一见到毛主席就“一边哭，一边告状”吗？你不是在毛主席表示“黑手就是我”后还敢于反驳：“不可能！……”吗？你的胆子不是挺大的嘛！你若当时就认定吴德是造谣，岂有不敢申辩之理？

所以说，你在毛主席的面前是默认了吴德的这个“打招呼”了。

三. 胡鹏池、但燊回复蒯大富，四小点

说完四大点，再说四小点。

几乎在所有的细节方面，蒯大富全都不能自圆其说：

1、你说“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可是与你同时回校的鲍长康却说他回来时静斋在开饭。按照常识，“12点多”包括在开饭时间内，而“10:30”距开饭时间至少还差半个多小时。

2、你说“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当时工人还未包围静斋，所以我得以顺利进楼。”

可是你的书中说：“回到学校附近，看见工人队伍正浩浩荡荡往校园里开——鲍长康回忆是爬墙回的学校，蒯大富回忆说当时是在工人队伍旁边走进清华的。”所以所谓的“顺利回校”也是不成立的。当然在12点多时，进入清华不久的工宣队还没有对静斋形成严实的包围，你们还是能够进入静斋的。

3、你说“当时开会有鲍，陈育延，任传仲等。”

可是鲍长康回忆说他没有参加会，而且还说有陈育延的日记为证。

4、你说：“如果我在上午就和吴德见过面，已了解情况，怎么会有我再冒险出去找市革委这件事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清华蒯大富》343页，你本人已经将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正如你说的，你上楼并不是为了找吴德，而是为了找谢富治。只是因为没有找到谢富治，遇到了吴德的秘书才顺便找了吴德。而且书中的对话部分纯属你单方面的叙述，遗漏、歪曲与失真之处不知有多少，你当然不会完整的记载吴德当时对你“出尔反尔”行为的指责。

以上这“四大点、四小点”是我们对蒯大富新谎言“10:30前回静斋”的回复。■

【评论】

真相的迷雾

——答章铎校友

俞小平

我写的《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以下简称《做人的底线》）有幸刊出在《记忆》杂志第152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八）上。我写此文的目的，其一是对我所亲身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的回忆，给将来的文革研究者或文革史爱好者留下具体事例；其二是我对聂元梓在文革中的罪行的个人理解，重点在她应负担的北大大武斗的领导责任；其三是对我在北大文革中有意或无意伤害的人表示我的道歉和忏悔。需要申明的是，我在文革中是一个无名小卒，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组织、任何一级的头头，也没有殴打、侮辱过任何人。但是我参加了所有师生员工都会参加的批斗会；批斗了陆平等校内大大小小的干部、教师、职工和学生；还在8341部队掌权工宣队时期参与专案组，整过我系副总支书记的专案，虽然专案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她。所有加在这些受害者头上的苦难都有我的一份，我凭我的良知作出我的忏悔。然后我想这事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不是一个文革研究者，又身处国外，不想为此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我的有关文革武斗的事实叙述与思考都已经在《做人的底线》里说清楚了。

日前收到《记忆》159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十），读到章铎校友的文章《给俞小平的一封公开信》（以下简称“章文”，引文以仿宋体录入）。一个从未谋面的北大校友，指名道姓地给我发公开信，预料“章文”的观点与我文中的认知必定大不相同，读完感觉果然如此，心中不觉有些怅然。

北大与清华向称中国高等院校的双璧。在文革中闹出的乱子也很相似。自从九十年代以来，清华文革的当事人写出了越来越多的文革回忆录和研究论文。自2009年以来，清华

两派的头头已经多次聚会，回顾当年的事件。2013年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出版后，清华的文革回忆与研究更上一层楼，他们对文革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武斗死亡者的过程??，从两派各自的角度叙述、分析，从而发现越来越客观的事实真相。今年甚至计划召开一百多人参加的清华文革讨论会，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会议流产。虽然会议没有开成，但是成果已经在那里了。

回顾我们北大，这些年来虽然文革当事人也有不少文章发表，但是两派大多数成员基本上是在各说各话，一些北大文革的事实真相，仍然笼罩在浓厚的迷雾中，在媒体上鲜见两派头头的文革回忆录，两派头头的谋面晤谈更是不可企及的梦想。

我不是一个爱跟人争论的人，写完了《做人的底线》，觉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没有想到会有人发公开信与我辩论。在公众场合对对手的话不予理睬，究竟是一件不礼貌的事，因此我不得不再写此文回应章铎校友。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的论述的顺序就按照章文的顺序安排。我的这篇文章包括三个部分：

- 一．回答章文中的问题；
- 二．补充几位北大武斗的受害者纪录；
- 三．结尾。

在阅读本文时，请参阅《做人的底线》，我在该文中已经详述的内容，本文不重复。

一．回答章文中的问题

（一）“章文”中说：“真的很谢谢你，因为这是我至今看到的唯一的一篇井冈山人说自己对武斗有准备的文章。”

俞答：如果章铎校友真的对北大两派有关武斗的文献有所关心，章校友绝不致于会有这样的印象。还是去读一读北大校友编的《燕园风云录》一、二、三、四集吧，那里面收集了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成员撰写的北大文革回忆录 116 篇；分散在其它文集、

杂志、网站上的文章应该更多。读完这些文章，章校友自会发现应该作出怎样的结论。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年的形势。当时北大已经从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学，变成一个暴力气味越来越浓的斗争场所，小规模武斗不断发生。

一笔名“田老兄”的北大校友在《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中有如下记载：

“1968年新年前后北大两派争斗表面趋缓，可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悄悄降临。这时公社开了个“二期学习班”，我也参加了，意在听一些故事。后来这个“二期学习班”变成准备武斗班，我就不参加了。”

“3月28日下午，……。吃完饭后许多同学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却又不知如何是好，静等灾难的到来。约8点，公社头头×××(类似情况以下都不指名)挨室告诉：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大家要有准备。我问：‘该怎么准备？’他却答非所问，支吾了之。其实他心中大概早已有数。”

“我在大喇叭的狂吼中入睡。半夜时分突然一阵人声、铁器撞击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井冈山攻占31楼！’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头。我赶紧穿了衣服，开了灯，推了推上铺的××：‘井冈山来了！’他毫无反应。我推开窗户上了窗台，转过身来，用手抓住窗台，伸下脚踩住一、二楼之间的突出砖棱。接着我放开手，做自由落体，用手又抓了一下砖棱，略曲腿，落地。这是事先早已计划好的。落地时我只后退了一步，毫发未伤。这时我才想到：××不能跟我这样下来，文革前他受过一次伤。同一宿舍还有×××。我希望避免同学之间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出了31楼，往哪里跑？我钻向学六食堂和浴室间的过道。‘站住！长矛！’一声断喝。一群身穿黄棉袄、手持长矛的武斗队抓住了我。接着铁棍、扎枪也上来了。我的头被铁棍打破流血，身上也挨了几扎枪，所幸不重。有4·11(1967年4月11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到北大游行，反对聂元梓。与新北大公社发生冲突——作者注)经验，我以为又是‘地院东方红一小撮暴徒’来了。‘你是哪里的？’‘我是北大的！’言外之意：你们是干什么的！来了个看样子是个头头的：‘我们是公社的，别怕！’

我还是不信，一言不发。估计他们也想到如果我是井冈山的该往东边 28 楼方向跑：‘大概打错了人，送 43 楼治伤。’我摸出身上带的学生证，里面夹着一张‘二期学习班’的证件。‘是自己人！’于是他下令赶快将我送往 43 楼。在此之前我还未有幸进过这里。43 楼早已有所准备，‘野战医院’大夫、设备一应俱全。我是这次大武斗公社方面第一个伤员，又是被“自己人”误伤的。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治疗。1969 年 1 月在呼和浩特遇到中文系的赵君、无线电系的陈君，他们正在讲：‘公社 3·29 武斗第一个伤员是被自己人打的。’他们问我知道吗？……”¹

章铎校友，以上叙述是一位新北大公社成员所写的 3.28~29 之夜的公社派的武斗攻势。公社派的计划和准备，您不会不知道吧？如果您认为井冈山成员不能做一星半点的自卫准备、而公社派可以在周密计划、充足准备以后发动武斗偷袭是一件乐事，那只是您的一孔之见。像我这样的井冈山成员并不想一个个束手待毙，让你们的武斗队抓进你们的 44 楼总部，严刑拷打，刑讯逼供。

我们技术物理系 17 纵的准备就是叫大家睡觉警醒一点，不要随便给人开门。3.28 晚因形势紧张，17 纵的总部委员程汉良带了一些人在 28 楼井冈山总部值班，我是其中之一。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袭 31 楼的井冈山 03 纵后，当我们试图去 31 楼救援时，在 31 楼前遭遇的是手持一米多长的，在校办工厂里专门制作的长矛，身穿制式军棉袄，头戴制式柳条帽，步伐整齐，训练有素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面对他们，我们毫无悬念地败退回 28 楼。所以井冈山的准备也就是这样的一点准备。井冈山准备自卫，没有准备进攻。井冈山在 40 楼怎样做的准备，我欢迎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双方参战人员揭开事实真相。

（二）关于孙蓬一

¹ 田老兄：《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载丛璋、亚达、林爻、戈辰编：《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2012 年 8 月，第 159-161 页。

俞答：由于我在文革后丧失了几乎全部有关文革的资料，我无法对孙蓬一过去的具体行为作评论。作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他是聂元梓最忠实的伙伴，聂元梓做了什么，他就做了什么。我不认为您翻得了他的案。在孙蓬一去世前，他已经承认自己在北大文革中犯下诸多错误和罪行，并痛心地向一些受害者赔礼道歉，您为他翻案未必符合他的心愿。

（三）关于聂元梓和校文革

俞答：工作组被中央文革赶走后，北大全校无异议地选举聂元梓任校文革主任，主要原因是，她是毛泽东支持的人。那时我和班上所有的同学一样，无条件支持聂元梓。直到年底，我们都没有支持“井冈山”、“红联军”的行为。1967年2月高教部夺权，北大与北师大闹了矛盾，那时我们班也由校文革派遣去高教部与北师大打架。到了现场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觉得被人“运动”了，回校后聂元梓又拒绝不同的意见。由此我们一部分同学产生了不满，种种不满的积累就是分裂。

但凡聂元梓谦虚一点，有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北大也不会走到那一步。陈伯达“6.5”讲话加速了北大两大派的正式形成，但是没有陈伯达的讲话，两大派照样会形成，只不过晚一点而已。由于文革的本性，在毛泽东蓄意造成的混乱局面之下，全国大多数单位都分裂为两派甚至几派，所有的派别都声称拥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聂元梓在文革前在北大并无名气，只是由于聂挑头签了那篇被毛泽东拿来当作文革突破口的“马列主义大字报”，才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巨大的权力，才获得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文革初期的两年内不得不死保的“铁券丹书”。这些政治上的争论已经有很多人参与了，我无意在此再增加一人。我的问题是：聂元梓有权与校党委分裂，把陆平和广大干部教师打成“陆平黑帮”而置于死地，这是不是分裂？聂元梓和校文革可以一路犯错误并拒绝检讨，这是不是分裂？怎么井冈山派不满聂元梓的作为就是分裂？为什么不承认这是聂元梓与广大井冈山人的分裂？

（四）谁发动的北大武斗？

“章文”中引用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孙月才所著《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记》——

“3月22日 晚上团长会议，成立武卫指挥部。”

“3月29日，晚发生大规模武斗，李钟奇副司令员、聂元梓被井冈山暴徒行刺。谢副总理、温玉成司令员来校制止武斗。并责令井冈山交出行刺暴徒。”

“3月30日 星期六。今晨2点左右，李副司令员来我总部，听取对学校武斗的意见。孙蓬一同志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李表示〔井〕要交出谋刺的凶手，如果不交，那么他要抓人。我们还对驻校解放军提出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支派不支左，这样下去将会犯极大的错误。”

俞答：章铎校友所引用的资料承认，3月28日夜之前有武斗，但是没有把全校陷于全面内战的大规模武斗。在此之前，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组织了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练了钢一连、革命工人兵团等专业武斗队，大量的武器和物资，由后勤部门制造、征发，调来听用，武斗队统一配发长矛、柳条帽、军棉袄、金属胸甲、等等，要对井冈山来一个“扫穴犁庭”。章校友不会不知道这些准备工作吧？章校友不会不知道井冈山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些装备吧？章校友为什么不谈谈新北大公社的这些武斗准备工作呢？

3·29武斗后，北京市革委会对北大局势不为不重视，当天毛泽东的文革宠臣、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以及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和副司令李钟奇）就来到北大，颠倒黑白，谴责被攻击的井冈山派挑起武斗，命令井冈山派交出武器，交出“行刺凶手”。愤怒委屈的井冈山人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北京市执掌大权的谢富治的权威就这样在井冈山人面前崩溃了。这完全不合逻辑，如果谢富治真的认为武斗是井冈山挑起的，他只要宣布井冈山兵团是聂元梓所说的“反革命集团把持的保守组织”，命令部队逮捕井冈山头头中的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不是已经被聂元梓的校文革送到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了吗？），井冈山不垮何待？可是谢富治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在北

大的每次武斗后重申空洞的制止武斗的命令而没有任何行动，而井冈山无视谢的命令，继续在北大楼群内坚守，甚至在北京全城遍贴油印大字报，据实反驳谢对井冈山的诬陷。7.27那一天，毛泽东一出手，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派立刻就垮了，团派是在武力抵抗后被打垮的，四一四派是主动放弃武斗的。由此可见，谢富治并不认为武斗是井冈山挑起的，也不相信井冈山是什么“现行反革命分子把持的保守组织”。但是在毛泽东表态之前，谢不敢贸然指责两年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爱将的聂元梓，他在等待毛的表态。

北大校友艾群在《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中引用如下资料：

“据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3月28日夜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几名主要头目来临湖轩找到聂元梓，强烈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武斗进攻令。须知，此前聂元梓所称北大武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武斗。其时所称武斗有着两个不同的含义：文革初期所说武斗，指的是对批斗对象实施拳打脚踢等暴力手段，相应的口号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包括两派群众发生肢体冲突，充其量只能算作打架斗殴。真正的武斗，准确说应该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成规模的武装冲突，相应的口号是‘文攻武卫’。1968年3月20日，新北大公社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北京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武斗即成规模的武装冲突，是3月28日夜聂元梓在临湖轩一声令下之后，由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于3月29日凌晨发起的。

遵照聂元梓的武斗指令，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向31楼发起武装进攻。31楼住着井冈山兵团的骨干力量0363（化学系63级）支队。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布置武斗任务时说：化学系（新北大公社）的同学要做出些牺牲。为避免同班两派同学互相残杀，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总指挥高云鹏调集09系武斗人员攻打31楼，怕他们不了解31楼两派住宿情况，事先在有井冈山兵团居住的宿舍都做了记号。29日凌晨1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武斗人员统一头戴柳条帽，身穿军棉袄，手持扎枪，发起突袭，驱赶井冈山兵团同学，武装占领31楼。他们遇到同一派的同学也不亮明身份，住在这里的新北大公社同学有的被

误伤，以为打伤他们的是井冈山兵团，从而大喊“井冈山发起武斗！”此时新北大公社的高音喇叭持续广播：“井冈山兵团悍然挑起武斗！”颠倒是非特强占领舆论制高点。”¹

艾群的文章引用的资料说明，大武斗是由聂元梓拍版的——“‘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武斗进攻令”的授权下开始的。聂元梓下令新北大公社“以优势兵力武力解决”势不两立的反对派——井冈山兵团。聂元梓是北大武斗发起方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者，聂元梓必须、而且已经为她的策划领导武斗及武斗中的人员伤亡负刑事责任。

北大校友司徒文在他的《亲历者讲述：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中说：

“1968年2月底，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单独接见井冈山的代表，一是劝他们承认聂元梓，承认校文革是北大的权力机构，这是中央的意见；二是承认北大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为北大文革作出过很好的贡献，聂元梓校文革要承认它；三是北大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如何成立，双方协商解决；四是解放军支左不支派。对此，井冈山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校文革”，聂元梓校文革则向中央文革反映说李的讲话在北大引起了混乱，声称怀疑李的讲话是否存在。”

井冈山代表在李钟奇接见后，依据李钟奇讲话与校文革会谈，校文革对李代表北京市革委会的讲话根本不认账，说井冈山造谣。显而易见，井冈山作为弱势组织，已经厌倦了无穷无尽的派斗，愿意联合，而校文革则一意孤行，要把井冈山武力除之而后快。

下面司徒文接着说：

“3月29日凌晨，38楼的同学正在熟睡，忽然寝室楼道里有人急喊：井冈山的人血

¹ 艾群：《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载丛璋、亚达、林爻、戈辰编：《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四），2016年8月，第194-198页。

洗了31楼，正准备攻占校医院，大家赶快起床，击退井冈山的进攻！我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跟着人们一溜小跑，来到燕南园南边西头，站在这条路去往校医院的路口。不一会儿。就仿佛看见有人从东边向这里走，这时带队的就喊：快，扔石头，把他们打回去！我们就趁黑摸着不知道是早就准备好的还是另外有人当即运来的砖头块。向对方人群扔去。我扔了两下，觉得胳膊就不行了。而且对方也再没有人向这里走了。这边人们好像也有人撤走了，我就也悄悄地一个人溜回寝室。这就是我在北大参加的惟一次武斗的经历。”

“后来才知道，3月28日是星期日。新北大公社早有预谋，要从31楼化学系井冈山的同学开刀。因为这里住着井冈山的主力与骨干0363(化学系63级)，31楼还是个战略要地。公社的孙蓬一布置这一行动时说：化学系的同学要做出些牺牲！据后来了解，为了避免出现同班同学互相残杀，高云鹏这位武斗总指挥也避了点儿嫌：攻打31楼的武斗队人员是从09系招募的，怕他们不了解31楼的住宿详情。事前在有井冈山同学居住的房间都做好了记号。

29日深夜1点整，公社武斗人员全副武装实行突袭，把31楼洗劫一空。遇到公社的同学也不亮明身份。只是往外撵。假如是井冈山的，就会被打伤。一些公社的同学不明真相，稀里糊涂往外走。被公社武斗人员撞见，没来得及说明身份，也被扎伤了。许多同学从睡梦中惊醒，怕挨打，迷迷糊糊急急忙忙向外逃，什么都没带。更有甚者，见来者不善。就从二楼甚至三楼往下跳，摔伤者甚多。加上被打伤的，共有100多人，个人物品、公共财产都蒙受了重大损失。”¹

“3·29”武斗还波及到别的楼群，住在35楼的一个井冈山派的女同学回忆说：

当时我和小×已进入梦乡，突然被一阵突发的嘈杂声惊醒了。我们不敢开灯，悄悄地

¹ 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载丛璋、亚达、国真编：《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2012年8月，第151-152页。

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只见井冈山男生住的30斋（俞小平注：文革前北大称学生的宿舍楼为‘斋’，文革开始后改为‘楼’，有些同学仍然习惯称‘斋’）那边灯光乱闪人声鼎沸，有男生变了嗓音地嘶喊：‘公社派的攻楼了！’接着我们就看到有些井冈山的男生只穿着汗衫裤衩从二楼和三楼的窗口跳下来，有的刚刚落地就被胳膊上绑白毛巾的人用铁棍狠狠地戳打。小×焦急地说：‘这样跳下来，又被这样子暴打，人还能有救吗？’我当时除了惊恐愤怒，剩下的就是透骨的无奈，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天亮之后，校园里议论纷纷。听我们班井冈山的男生说，当天夜里他们住的40斋也同时被新北大公社的人突袭了。包围之后一部分人还冲进了楼里。井冈山的同学就组织起来往外冲，有的也从二楼三楼窗口往下跳。不少人冲出来时被对立派从楼上扔下的砖块砸破了脑袋。有的被对方用铁棍、长矛打伤。

这次武斗中受伤的同学不计其数，我们班的男生Y被公社派的人用长矛刺成重伤，送进医院急救。医生说他身上总共被刺了17枪，幸而都不在要害部位，侥幸保住一条命。但有一枪扎在大腿的股动脉和静脉之间，造成动静脉瘘，那部位还长了两个瘤。后来又在北医三院做了13个钟头的大手术。怕他父母担心，不敢告诉实情。是我们班的男生W代替家长在手术单上签了字。”¹

这位司徒文校友，也是一位新北大公社成员。他没有隐瞒新北大公社主动策划、组织、向井冈山发起武装进攻的行为，而是说出了事实真相。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新北大公社成员凭着自己的良知，说出他们所亲历的北大武斗真相。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到，3月28日夜聂元梓在临湖轩新北大公社团长大会上的决定：“打，你们要打，就打吧！”得到了完美的执行。所以我在《做人的底线》里说：3月29日早晨，“聂元梓装着没事人的样子，快意地观赏她的部下造成的后果。”并没有冤枉她。

¹ 散淡天涯：《北大“3·29”武斗印象》，载丛璋、亚达、国真编：《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2012年8月，第158页。

如果章铎校友认为以上文献不够，您尽可以上网阅读更多同学关于北大文革武斗的回忆录。

（五）“行刺”聂元梓事件

俞答：当年所谓的“刺聂嫌犯”樊能廷已经写了长篇的《北大文革“刺聂”乌龙》¹说明真相，网上可以查到。读当事人写的文章，比我在这里重复要好。

（六）3·29 武斗后的换俘

“章文”中引用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孙月才所著《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记》中又说：

“3.4 点钟,交换双方俘虏。(井)被我俘虏者受到宽大待遇,不打一棍,均笑逐颜开,并写了认罪书,自觉地要求发表声明,造(井)的反。我被(井)俘的,都被打得不能走动。几乎人人被打破头脑,真是法西斯暴行。我们许多战士见了自己的战友都哭了。”

俞答：3.28 夜至 3·29 凌晨，我在 28 楼亲见井冈山派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打断腰椎的、昏迷不醒的，用卡车一车一车地送往北医三院抢救。此时的北大校医院已经是被校文革派给新北大公社专用的军医院，井冈山成员无缘在那里得到治疗。我的同班同学郭青苔 3 月 29 日凌晨被公社武斗队抓进 44 楼公社总部，严刑拷打，打断腿骨。我本人在 4 月 10 日左右被无端抓进 44 楼，打得头破血流。我班女生周振琦 6 月份被抓进 40 楼，拷打几日，放出来时精神失常。这些都是我和我班同学的亲身经历，有名有姓。我要请教章铎校友，孙月才文中的被俘井冈山人姓甚名谁？为了什么理由，怎么就被你们抓得、打得、关得“笑逐颜开”了？“战俘”被迫写了“认罪书”，你们居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一个心理正常、有良心的人应该说的话吗？在所有我读过的清华、北大两校的文革回忆录中，我从

¹ 樊能廷：《北大文革“刺聂”乌龙》，载华新民编：《华夏文摘》第九四七期（zk1406c），2014 年 6 月，网络版。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心理反常。清华团派围剿四一四派，有这样残暴的，没有这样卑鄙的。3·29凌晨的武斗是聂元梓下令新北大公社主动进攻挑起的，公社的武斗队员被井冈山俘获，是在井冈山的自卫中发生的。如果在4月初两派“换俘”后还有公社的人被井冈山抓捕，请您真名实姓地揭发。

在谢富治的主持下，两派交换了3·29武斗中的“战俘”。但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捕的数百名干部、教师还是关在校文革的浑名“牛棚”的劳改大院里，日夜折磨、殴打、凌辱、批斗，又陆续抓捕数百名井冈山兵团成员关在新北大公社的武斗据点里刑讯逼供。在当年的历史系青年教师、而今退休的北大副校长郝斌所著《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里，郝斌对校文革的诸多暴行作了血泪的控诉。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北大劳改大院的监改人员、公社武斗据点的武斗队员对被害人的赔礼道歉，更不要说对他们所施加暴行的忏悔了。章铎校友，对于这样的状态，您不觉得遗憾吗？

我在《做人的底线》里说过，3·29武斗以后，两派交换了“战俘”。从此以后直到大武斗结束，井冈山只抓过两个人。一个是文革前的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戴新民。我参与了对戴新民的抓捕，我已在《做人的底线》里公开向她道歉。我系井冈山派同学俎栋林教授在微信里告诉我，他在1980年向戴新民当面道歉，戴接受了道歉。另一个是从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手里夺取的一个公社派武斗队员，第二天就用他交换了公社武斗队在新街口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抓走的三个老井。我不认为夺取这个公社派武斗队员是做错了事。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面对强权，我们有权自卫。

章铎校友，在北大四个月大武斗中，新北大公社是不是加害的一方？井冈山是不是被害的一方？章铎校友应不应该谈谈这个话题？北大校文革被毛泽东认定为“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武斗占了很大的成分。章铎校友，不要逃避了，您是绕不过去的。

下面我还要谈樊力勤这个当时北大无人不知的案件。田老兄在《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里叙述了他是怎样救了樊立勤一命的：

“处置完伤，我该休息一下了，可是又怎能睡得着呢？此时天已微亮，北大校园乱成一团。两派的大喇叭死命嚎叫。于是我出了病房在楼内到处看看。我走到一间屋前，只见屋门敞开，窗户上蒙着黑布，里面亮着个蓝灯泡，地上躺着个被打得昏迷不醒的人。这时过来个人，告诉我这是樊立勤。一句话就够了。怪不得井冈山前几天嚷道樊立勤被公社绑架了，果然如此，不知为什么我这时竟想到父母惨遭毒打时的情景

正在此时只听见楼下一阵人声和棍棒声。

‘打死樊立勤！’有人狂吼。我见事不好，随手抓起楼道里放的预备武斗用的一根长约4CM、长约两米的铁管，望小黑门前一堵。一群人冲了上来，被我手持铁管挡住。有人说：公社的XXX被井冈山抓住打得快死了。打死樊立勤为XXX报仇！（自己的人还没死就要打死对方的人“报仇”，什么逻辑！）

我说：‘樊立勤就真是反革命，该枪毙，也要由法院判。不能随便打死人。’他们想硬冲又有顾忌：一则与这几位相比，我可算身高体壮、膀粗力大，二则能进到这里肯定是公社的‘自己人’。再加上包了一头纱布，肯定刚从‘战场’下来的，像个亡命徒。他们也不敢乱来。谁知道我是被公社武斗队打伤的‘逃兵’！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这时来了一个头头说：‘不能打死樊立勤，要和井冈山交换俘虏。’（只有战争才会产生俘虏，两派争斗是战争？）

那伙人这才罢休。我看没事了，也就扔掉铁棍走开。”¹

然后才发生了颜品忠在《一个北大哲学系普通教师的动乱劫难》一文²所述的樊立勤在濒死昏迷中被扔到43楼外面的状况。

请问章铎校友，当樊立勤已经在3月27日被新北大公社抓进43楼日夜拷打，往樊立

¹ 田老兄：《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载丛璋等编：《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2012年，第162页。

² 颜品忠遗作、颜吾爰整理：《一个北大哲学系普通教师的动乱劫难》，载丛璋、亚达、国真编：《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二），2013年9月，第175-178页。

勤的膝盖上钉铁钉，用竹签扎手指，校文革还贼喊捉贼地通缉“现行反革命分子樊立勤”，是不是事实？校文革发通缉令抓捕，新北大公社凶残动刑，是不是犯罪？请章铎校友不要逃避，直面这个自北大1898年建校至今，历经满清、民国、北洋、国民党、中共等100多年的不同时期，最残酷、最卑鄙的犯罪行为，说清楚决定通缉樊的是谁？实施抓捕樊的是谁？严刑拷问樊的是谁？在几天几夜的拷问后，樊行将待毙时，把业已休克的樊立勤扔出43楼的又是谁？说出来吧，章铎校友！

樊立勤在他写的回忆录《风雨同窗》里记述了他被新北大公社酷刑拷问几天几夜所造成的伤害：

“我的右腿被聂元梓一伙在审问时打断腓骨，接上了仍不灵活，左腿的膝关节被他们钉进了钉子，膝盖碎了，几次手术，依然僵直。右臂尺骨被打断，接错了位，我刚放下双拐不久，走路极不协调，稍一用力，全身疼痛难忍。”（俞小平注：以上樊立勤的身体状况是1970年的状态。）¹

章铎校友，面对樊立勤的控诉表一下态吧！

（七）高云鹏问题

“章文”中说：“你应该向他道歉。”

俞答：在高云鹏问题上，我不是高涉及的各个事件的亲历者，理所当然地要引用别人的文献。仅据章铎的公开信，我个人觉得章铎的文章的可信度不如《北京大学纪事》相关章节。聂元梓作为高云鹏在文革中的顶头上司和密友，说她竟然会不了解高云鹏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众所周知，文献的作者对文献负责。章铎校友，您是在北大上过几年学，读过学术文献的，应当知道这个做学问的起码规则。如果真的有人要道

¹ 樊立勤：《风雨同窗》，载《梦萦未名湖》编辑部：《梦萦未名湖（下）》，香港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第354页。

歉，您为什么不叫您的头头聂元梓向高道歉呢？公社派的司徒文在他的《亲历者讲述：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中说：“据后来了解，为了避免出现同班同学互相残杀，高云鹏这位武斗总指挥也避了点儿嫌：攻打31楼的武斗队人员是从09系招募的。”看来不仅仅是《北京大学纪事》和《聂元梓回忆录》认定高云鹏是新北大公社的武斗总指挥。高云鹏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伤害了那么多人，我没有听到高先生一句道歉。

（八）工宣队对两派的态度

“章文”中说：“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这些做法，显然是打击了一大片，对井冈山兵团中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打击，更是造成了很坏的结果。但这与‘支一派（新北大公社）打一派（井冈山兵团）’挂不上钩。无论是63军为首，还是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是按毛泽东的旨意办事的，两个宣传队没有伯仲之分。”

俞答：1968年8月19日起，毛泽东派驻北大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北大，由63军执掌大权。军方对北大两派态度大不相同，驻石家庄的63军支持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而驻保定的38军则支持井冈山兵团。以至于韩爱晶记录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里说：“毛主席说：‘你（俞小平注：指聂元梓）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就该做38军的工作。’”¹这还不够清楚吗，连毛泽东都知道63军支持聂元梓。

聂元梓在北大掌权的两年里（1966年8月～1968年8月），校文革频繁地把很多反对她的人和组织打成“现行反革命”。63军为首的工宣队在他们掌权的7个月里（1968年8月～1969年3月），在北大整了九百多个专案，其中整人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提交的。我所亲见的被整的人，几乎都是井冈山或非井非公社的，而鲜见公社的。校文革在武斗中就在抓樊立勤、牛辉林和徐运朴等人的多个“反革命集团”案，并且开过多次批斗会。工宣队对井冈山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打击，与校文革在武斗中对那些同

¹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样的井冈山“反革命集团”的打击毫无二致，不是昭然若揭吗？

章铎校友在“章文”中谴责了工宣队“对井冈山兵团中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打击，更是造成了很坏的结果”，您为什么不谴责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所谓“反革命集团”的同样的打击呢？

虽然井冈山遭受聂元梓校文革和63军工宣队的接连诬陷和打击，但是在文革结束后井冈山成员没有一个被判徒刑或被定为“三种人”，这在高校群众组织中是罕见的，也说明校文革制造的案件全部都是冤假错案！

在文革初期，所有的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声称自己是效忠毛泽东的，否则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根本不要想能生存下去，这是人人皆知的原则。但是随着运动的进展，个人和组织都会产生自身的利益，在自称效忠伟大领袖的同时，做出不符合毛泽东筹划的事情。63军出于自身与聂元梓校文革的亲密关系，利用掌管的工宣队的权力打击井冈山派和非井非公社派，但是这些做法并不符合毛泽东营造天下太平、召开九大收割文革果实的目的。正因为毛泽东对63军为首的工宣队在北大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很不满意，才会派出他的御林军8341部队来夺63军的权。当时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¹里批评63军为首的工宣队“支一派（新北大公社）打一派（井冈山兵团）”，校文革是“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结论，难道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吗？

8341部队对北大师生的继续迫害是以后的事，在此不论。后来8341部队把聂元梓打成“五一六”分子，与井冈山并无关联，北大两派都有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的，井冈山人未曾诬告聂元梓为五一六分子。

（九）关于对聂元梓判刑的问题

¹ 中共中央：（中发〔1970〕17号）《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1970年3月5日，载丛璋、亚达、国真编：《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二）》，2013年9月，第334页。

“章文”中引用我在《做人的底线》中的论述说：

“如果聂元梓不忏悔她所犯的罪行，她就没有资格为法院对她罪行的某些错误定性喊冤。因为聂元梓还有你列举的六大罪状：

诬陷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这个革命群众组织为“反革命集团把持的保守组织”——诬陷革命群众组织罪；

策划并指挥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围攻井冈山兵团——策划并指挥武斗罪；

在北大、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内抓捕井冈山兵团成员——非法逮捕公民罪；

设立非法私刑监狱(牛棚)监禁北大师员工——非法监禁公民罪；

在校文革设立的监狱里，以残酷私刑拷问折磨井冈山兵团成员——酷刑罪；

在校文革控制的区域纵容残酷的私刑迫害，致使三人死亡——纵容杀人罪。

对文化大革命中聂元梓自己干的事情，她当然要负起政治责任。但要把当时北大所有的坏事都归为聂元梓的错误和罪行，显然有失公允。如果按此推理，文革的始作俑者又该承担什么罪行呢？”

俞答：章铎校友对我声讨聂元梓在北大武斗中所犯罪行深为不满，尤为不满我给聂元梓拟定的“六大罪状”。我例举的聂元梓的六大罪状有我在《做人的底线》中所述的事实作为根据。但是章铎校友不必担心，聂元梓已经为她的罪行于1978年被捕正式投入监狱，已经于1983年被法院判处17年徒刑，已经于1984年保外就医，已经于1986年假释，已经为她的罪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今她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作为她曾经的对立面，一个有良知的人，我自然不会再跟她过不去。所有这些讨论，只是理性的，既没有聂元梓当年迫害反对派那样的狠心，也没有校文革私设监狱将其实施的权力。

章铎校友在讨论我声讨聂元梓的六大罪状时，没有否认这六大罪状确实是罪行。六大罪状是校文革迫害井冈山兵团或非井非公社派的罪状，没有作为校文革最高领导人的聂元梓的许可，谁敢犯这些罪行？作为“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校文革的最高领

领导人聂元梓理所当然地负有这些相关罪行的领导责任。

而我，并没有像章铎校友所说，把“当时北大所有的坏事都归为聂元梓的错误和罪行”。至少我没有把占北大师生员工几乎一半的井冈山人在当时所犯错误推到聂元梓身上，难道章铎校友不承认北大井冈山人是北大人吗？我并没有把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些人所犯罪行都推在聂元梓身上。比如我所列的第6条：“在校文革控制的区域纵容残酷的私刑迫害，致使三人死亡——纵容杀人罪。”在此我认为聂元梓犯的是纵容杀人罪，而具体杀人的新北大公社成员则犯有谋杀罪。聂元梓不仅要负您所说的“政治责任”，而且要负您所没有说的“刑事责任”。

“章文”中说的“不知你是根据美国的法律还是根据中国的法律给聂元梓定了这六大罪状呢？”如果您读过一些国家的刑法，您就会理解各国刑法其实无大区别，不过是“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延伸而已。文革期间的很多罪行史无前例，甚至在中国都没有具体适用的法律条款。我在《做人的底线》里给聂元梓拟定的罪名，是按照刑法学中案例法的原则、根据已有刑法条款给聂元梓拟定的。

至于文革的“始作俑者”的责任，章铎校友可以去读郭道晖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略》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此恕不赘叙。

二. 补充几位北大武斗的受害者纪录

在我写的《做人的底线》里，除了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打死的温家驹、殷文杰和刘玮以外，所有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伤害的具体人员都是我认识的，包括我自己、我的同班同学、与我不同系的同学，等等。在此我要增加几位我所认识的人到受害者名单里，他们都是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某些成员所犯的非法暴行的受害者。

（一）王志良

王志良是数学力学系66届研究生，极有才华。文革中是井冈山兵团文艺宣传队“万岁纵”的乐队指挥，我是乐队队员，故此认识。王志良虽然是井冈山成员，并没有参加武斗，武斗期间一直待在北京的家里等待分配，已经在北大领工资。新北大公社不知从哪里得到信息，说他有不利于江青的言论。校文革借口给他送工资，诱他开门，武力抓捕，把他扔上公社武斗队卡车，绑架到北大校内的新北大公社私设监狱关押，严刑逼供，直到工宣队进校才予以释放。

（二）郑培蒂

文革前郑培蒂是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青年教师，1963年担任化学系、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等三个系的化学专业63级的公共英语课教师（当时的学生学俄语的多、学英语的少，三个系的63级化学专业英语学生合班大约40人。）她是我的英语课任老师。后来，她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英语教师，拥有学生近百万，影响了一代人。郑培蒂老师著有散文集《云卷云舒》，¹我在此摘录其中的《毕竟幡然一书生——悼周一良、邓懿二位先生》一文中有关章节，看看聂元梓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丧失天良的干将们是怎样在诨名“牛棚”的劳改大院里惨无人道地非法抓捕、关押、侮辱、折磨郑培蒂和数百名北大教师和干部的（俞小平注：文中的小标题是原有的）：

牛棚岁月

我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讲过江青曾与我表舅黄敬（俞启威）同居过。对立派“新北大公社”一个同事揭发我跟她讲过这事，即便我是文革前几年讲的，仅仅因为我参加了反聂元梓的“井冈山”派，他们必须打倒我来削弱井冈山的势力，便一口咬定我是“造谣”。红卫兵们等我把儿子一生下来，就跑到家里来抓人，将正在吃奶的婴儿一把扔开，

¹ 郑培蒂：《云卷云舒》，（美国）独立中文笔会，2003年9月，第132-137页。

当着我婆母的面推着我踉踉跄跄下楼，一卡车的“小将”们把我押回北大。

在受过各种审问和侮辱后，我被关进了“牛棚”，从此失去了自由和人格。我父亲、母亲、弟弟都受牵连，分别被“隔离审查”，因为世敏远在西藏，婆母只好带着嗷嗷待哺的初生孙儿回到广州。我带着洗漱用具，换洗衣服以及简单的铺盖，被押往牛棚。我才发现：外平的教室用苇席给圈了起来，以民主楼为“指挥部”，在民主楼和外文楼之间建成了大门，有“监改人员”日夜把守，他们是各系挑来的学生，也有学校庶务处乃至图书馆的工人，都是铁杆保聂派。

我给分配到最西边的那一间。“室长”是地质地理系的党总支书记陈凯。她一见来了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年轻教师，便把她的铺盖挪了挪，叫我睡在她旁边，挨着墙。同一个房间的有北大一些党政负责人，包括彭佩云。我意外地见到邓懿先生与我同屋，牛棚纪律规定不许彼此交谈，她只跟我点了点头。

我们都睡在地上，只铺了点稻草，夜晚砖地的凉气直袭脊背。成群的蚊子在耳边飞舞，好像也仗势欺人，我被咬得体无完肤。记得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地上望着破窗外的夜空，流着泪，思念刚出生的儿子，思念远在西藏戍守边疆的丈夫，不知何时才能熬出头。

地狱煎熬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驱赶到院子里排队、训话。监改人员先把我们臭骂一通，然后打开“红宝书”，要求我们当天背诵哪几页哪几段“毛主席语录”，晚上收工时检查，接着分配当天的劳改任务。散队时，我偷偷瞄了男“院士”们（既然是劳改大院，那我们都应当是“院士”啰！），不仅见到我熟悉的东语系、西语系的老师，还看见周一良先生，他已满头白发，似乎瘦了一圈。周一良夫妻双双被关进牛棚，根本原因是周一良先生参加了“井冈山”这一派，反对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

我们在劳改大院，不许私自交谈，不许抬头，不许翘“二郎腿”。无论跟监改人员说什么，首先要喊“报告！”才可以说话。（我获得自由后很久，还改不了这个习惯，在家里说

话也先喊“报告！”妈妈陪着我掉泪。)红卫兵常常“提审”，或者押我去开批斗会。他们揪着我的辫子，强迫我弯腰，那是当时流行的“喷气式”，我回到牛棚就把辫子剪了，以免下次再给揪得生疼。

夫妻一同关在劳改大院的不多，而且不许交谈。有一次大概是家里有急事，必须商量，周一良和邓懿就在监改人员的监视下，站在院子面对面低头匆匆谈话。他们说什么，那几个围在他们身边的监改人员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只有从房间里偷偷望着这一对学富五车的患难夫妻，替他们难过。

监改人员兴之所至就折磨人寻开心。一日天气炎热，他们坐在院子里一颗大树下乘凉，叫我和朱光潜先生接了水一盆一盆泼洒在土地上为他们解暑。给我们派这“轻活”，因为我刚生完孩子，体质很差；朱先生是西语系的教授，美学界的权威，白发苍苍，瘦弱不堪。红卫兵们甩着打人的皮带问他：“老家伙，想怎么死？上吊有绳子，抹脖子有刀子，你要那样？”我十分害怕，只见朱先生照旧泼水，好像没听见，使我既感且佩。

又有一次，是中午，不知邓懿怎么得罪了监改人员，他们不许她吃饭，叫她到院子当中罚站，并且强迫她仰着头直望太阳，不准低头，不准眨眼。邓懿本来高大，因为瘦了，衣服仿佛“挂”在身上，脚下是一双黑布鞋。那天她在毒日头下站了很久，并不求饶，那倔强的模样，令我至今难忘。

百般受辱

我们的劳动项目很多，最多的是拔草，分成小组，在校园各处拔野草。外面到北大来串联的人就像看到野生动物一样围观，他们有权利问我们的姓名和罪行，有权利对我们拳打脚踢。几个月下来，又不许回家，我没有机会洗澡洗头，只在民主楼后临时安装的水管那里接点凉水随便擦擦一身的臭汗。我们这群人排队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要掩鼻而过。身上脏，我们尚可忍受，最难忍受的是精神上所受的侮辱。

除了每天早晨的训话，每天晚饭后，监改人员还要叫我们在院子里排队训话。讲话的

人不固定，但是有共同的内容，就是极尽侮辱折磨之能事。他们站在队伍前面一个小讲台上，开口就是：“牛鬼蛇神们，乌龟王八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蚊子开始肆意地咬我们，不知从哪里钻来的孩子们走进队伍向我们啐唾沫，我不止一次地被一个女孩狠狠掐过，因为她父母跟我不一派，她还嫉妒我曾主持过大礼堂的春节晚会。

劳改大院的四周是小山坡，在黯淡的灯光下，影影绰绰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没有孩子们走进院子的勇气，却又压抑不住好奇心。监改人员有了“观众”，越发得意。他们会随便揪出一个“罪犯”来，叫他背诵当日指定的毛语录段落。稍有磕巴，就是一顿毒打。他们没有揪我出来背，因为知道我能背下来。他们专门与老先生过不去，尤其是国外回来连中文都说不好的老教授。教过我的徐锡良老师是美国华侨，因为爱国，全家投奔祖国。他的英语口语非常好，跟美国人没有不同，可是他讲中文有困难。他总背不下来，便遭毒打，还叫他头顶一碗水在搓板上跪着，徐先生从劳改大院放回家不久就溘然长逝了。文革一结束，他悲苦的妻子带着成年的儿女又来到了美国。

劳改大院的监改人员有些是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肯定不好，便迁怒于教过他们而又不给好分数的老师。我认得的教公共俄语的王家福，是个严格的老师，常常被生物系的一个学生“提审”，王老师被打得脸肿不能说话，浑身青紫。夜晚，从“刑讯室”常常传来监改人员的怒吼声，清脆的耳光声和皮鞭、棍棒的声音，还有受刑者悲惨的叫声。

郑培蒂的《云捲云舒》的引文到此结束。从郑老师的回忆录中，读者们可以了解到什么是惨不忍闻的“牛棚”了。章铎校友，请您断定，郑老师文中所说的是不是事实？请您解释，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某些成员为什么要犯这样的邪恶罪行？这些人有没有做人的底线？

1978年4月8日，在北大全校批斗聂元梓、孙蓬一罪行的大会上，郑培蒂老师作为受害者代表之一在大会上发言，对聂元梓、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某些成员所犯罪行作了血泪

控诉。¹对于在“牛棚”里惨遭非法抓捕、关押、侮辱、折磨的干部和教师，这是他们伸冤的一天！

（三）我的两位同班同学

我的两位同班同学，他们坚决不愿我暴露他们的姓名，姑且称为W男生和L女生吧。这两位同学不是新北大公社或井冈山兵团成员，很少参与校内活动，但是校内观点倾向于井冈山派。武斗期间，W与L被校文革以“现行反革命”罪名下令新北大公社从他们家中拘捕，关在第二体育馆的浴室里，照旧是严刑逼供那一套，在几个月的关押期间生不如死。武斗结束后，他们被移交给工宣队继续关押，并曾押回所在班级接受批判，直至1969年3月8341部队进校后才把他们释放。几十年来，L女生不能谈、也不能听任何人谈论这件事，这种痛苦终将跟随他们一生。而逮捕、关押、审讯他们的新北大公社成员，从来也没有对他们道歉。如果这不是冤案，为什么工宣队掌权后不予正式逮捕、而8341部队进校后又将他们无罪释放？如果章铎校友对我所说实情有所怀疑，您可以去问您的朋友、我的同系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同学、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宫香政，他必定能给您提供详情。

三. 结尾

令人遗憾的是，北大文革真相至今仍然处于一片迷雾之中。一个并不复杂的四个月大武斗，双方都说不到一起，遑论其他？■

2016年9月22日

¹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评论】

毛泽东与《新北大》

智 晴¹

凡是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人，几乎无不知晓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所控制下的《新北大》小报之报头为毛主席所题写。在不到十天之内，应聂元梓的请求，毛泽东曾两次为该小报题写报头，且首次题写之报头出现了笔误，却鲜为人知。

为了讲清这个真实的故事，笔者不得不把话扯得稍远一些。敬请读者鉴谅。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即1966年6月1日，身在杭州的毛泽东从《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写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看到了刊载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毛泽东对该大字报极其重视，认为，“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²他当即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

这里顺便提一下，以往一些论述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中，在谈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时，说康生背着在京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手稿送给了毛泽东。此等传说缺乏可靠的根据。故未被《毛泽东传》的编者采用。

¹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² 《毛泽东传》下，第1414页。

就在毛泽东做出上述批示的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次日，即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执笔，以评论员名义写的重头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此举，确如毛泽东所谋料的，成为他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排除来自领导层的阻力，“打乱原有的秩序”之“有效的突破口”，为整肃刘少奇拉开了序幕。一时间，不仅在北京大学炸开了锅，首都各大专院校乃至中学也乱了起来，并波及全国。正如毛所说：“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¹这是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首次成功利用。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传出后，使人们，尤其是北大人震惊万分并大惑不解。北京大学这所有着光荣传统且享誉国内外的学府，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和笔下，竟然成为必须“打破”的“反动堡垒”。人们实在弄不懂他老人家对北大为何有此深仇大恨。

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的第二次利用，是在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

1966年8月1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经最高领导钦定，聂元梓和大字报的另一名作者列席会议。8月5日，毛泽东在全会上抛出了惊人之笔：《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当时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该文劈头一句就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誉为“马列主义大字报”，并将该大字报列为全会学习的重要文件。

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七日印发中央全会。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立刻改变了全会原有的议题和日程”。在写这张“大字报”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的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秩序。”全会的最后一天选出“扩大到十一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秩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列为第二位，而刘少奇却降到第八位”。²显然，毛的“大字报”虽未公开点名，但与会者一看便知：矛头直指刘少奇。

此举，充分证明毛泽东又一次成功地利用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作为在中央最高层

¹ 见《毛泽东传》下，第1417页。

² 《毛泽东传》下，第1428~1429页。

搞掉刘少奇的“有效突破口”。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还有一次对聂元梓的直接成功利用，那就是在文革初期指示她赴沪串联，支持上海造反派。对此将另文述说。

毛泽东的这一奇文很快就传了出来（一年之后即1967年8月5日方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刊出），即便是在个人迷信疯狂盛行的当时，一些有思想的人也感到莫名其妙：不就是一张批判宋硕、陆平、彭珮云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么，怎么成了“马列主义大字报”哩。想归想，但当时谁也不敢说。就连笔者当时接触到的该大字报的几位作者，他们一方面为毛泽东对大字报的极高评价受宠若惊，兴奋异常，但另一方面对他们所写大字报的“马列主义”性质也不得其解。他们猜测，所谓“马列主义”是否指的造反精神？

由于毛主席的支持和重用，一时间聂元梓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最大的造反派头头，位居造反派“五大领袖”之首而更加大红大紫。

行笔至此，该回到本文的主题了。

在文革之前，北京大学原本有一份为全校广大师生所喜爱并享誉全国高校的校刊。其编辑部归校党委宣传部领导。1966年6月3日，李雪峰任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原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并取代北大党委之后，该校刊即被停刊。196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李雪峰主持的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在康生、江青等人召开的北大万人大会上张承先被批斗后工作组随即撤离北大。

在此之后，分管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是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王原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颇受毛泽东的欣赏和重用。此时，他是遵照毛的意图大力支持聂元梓的，亲自指定聂牵头出面运作，尽快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在王的支持下，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于1966年8月初成立，聂元梓任筹委会主任。此后，王任重又指示，要采取自下而上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的办法，从群众中推选代表，召开代表大会选举成立校文革。在王的亲自指导和过问下，北大文革代表大会于1966年8月30日召开，王

参加了大会开幕式，聂元梓被选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校文革筹委会成立不久，有人向聂元梓建议，应尽快恢复北京大学校刊，作为校文革的机关刊物。聂表示同意。经校文革核心会议研究，为了与原北大党委划清界限，体现革命造反精神，决定将北京大学校刊更名为《新北大》。鉴于聂元梓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与会者建议由聂出面请毛主席为《新北大》题写报头。聂很有把握地说：没问题，这事由我来办。彼时，聂是毛泽东最为重用的造反头头，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因而，有求必应。对此，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提及，她写道：我请毛主席为《新北大》题词，他“很爽快地答应了。”¹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或中央文革办事组）通过机要交通送来了一份急件，由校文革办公室签收。此件非同小可，在硕大的信封上赫然展现：

送北京大学

聂元梓 同志

毛泽东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怎敢怠慢，兴冲冲地将信件急送聂元梓，喊道：老聂，毛主席给你来信了。当时在场的包括笔者在内约7、8人。大家猜想，此件定是伟大领袖为《新北大》题写之报头，均怀着极其兴奋喜悦的心情急切地等待聂元梓开封。然而，当聂元梓启开信封将老人家的御笔展现在大家面前时，众人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哑然无语。原来毛主席将“新北大”写成了“新北大”。给“北”字多加了一划，写成了“𠂇”字。本来热热闹闹的欢庆场面顿时鸦雀无声。当时，给笔者的第一印象是“笔误”，我想大约其他人亦有同感，但无人吱声，生怕对伟大领袖有不敬之言。沉默良久，聂元梓先开口：“这可怎么办！”按当时的社会氛围，伟大领袖为北大题写报头，乃天大的喜事，是北大的莫大荣耀和幸福，必定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大肆庆贺，但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是，若将此件向

¹ 见《聂元梓回忆录》第194页。

群众展示，岂不是让老人家露怯丢丑，那罪过可大了去了，怎么上纲上线兴师问罪都不为过。经过众人一番议论，聂当即宣布，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谁也不准向外透露；否则轻说有损伟大领袖的威信，弄得不好还会按“恶毒攻击”治罪。众人皆知此事之深浅，在十几年内皆紧闭嘴巴，未透露丝毫风声。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时在场的有人提出，为了慎重起见，是否可通过中文、历史系文革筹委会负责人悄悄地向正在被冲击的魏建功等精通古文字的老专家询问一下，在古文字中东西南北的“北”是否有“𠂔”这样写法。聂元梓表示同意，但强调绝不能透露主席题词之事。当即分工由另外二人分头找历史系文革筹委会主任和中文系文革筹委会主任具体布置。情况很快汇报上来：两系精通古文字的专家均说未见有此种写法，亦未见过有“𠂔”这等字样。

面对上述情况，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聂元梓感到十分棘手。随即召集当时在场的人员进行商讨。议论的结果是：由聂元梓出面将原件送还主席，就说主席的“新北大”题词对北大的革命师生员工是极大的鼓舞，全体革命群众衷心感谢伟大领袖对北大的关怀与支持；《新北大》校刊将以主席的题词为报头出版，请老人家再审视一下，对原件是否满意。至于聂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将原件送还的，是书面还是口头表达上述意思，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原件退还后，众人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回音。大家最为担心的是此举是否会触怒伟大领袖，会不会使题词问题泡汤。孰料，过了不到一周的光景，中共中央办公厅（或中央文革办事组）就通过机要交通送来了毛泽东题写的《新北大》报头（见原件复印件）。



同时还附一便签：

聂元梓同志：

如不好，可再写。

毛泽东

上述题词的原件和所附便签，均已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接到题写报头的御笔，聂元梓和校文革一班人欣喜若狂。随即召开全校大会，向广大群众展示御笔，隆重庆祝，大造声势。一时间北大校园里锣鼓喧天，连呼万岁，好不热闹。

毛泽东应聂元梓的请求两次题写“新北大”，特别是他书写的便签“聂元梓同志：如不好，可再写。”清楚地表明，当需要造反派支持时，或者说当造反派有很大利用价值时，他老人家对聂元梓等造反派的头头是何等的关照，何等的谦虚。此举也大大太高了聂的身价，也是她最为得宠的一次。

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领导不仅将毛题写的“新北大”作为校刊的报头，同时还将写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旗、信封之类统统依样更换，就连支持聂和校文革的群众组织也取名为“新北大公社”。当时曾有学生强烈要求将北大西校门的“北京大学”校匾拆除，代之以全新的“新北大”校匾。考虑到原有的“北京大学”校匾亦为毛泽东所题写，聂未同意。

以毛泽东题词为报头的《新北大》校刊很快就出版了。自此，这个小报便成为聂元梓和校文革宣扬最高最新指示、不遗余力地鼓吹和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极左路线、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工具。北大分裂成两派之后，又成为派性斗争的工具。1968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尤其是迟群、谢静宜之流掌握了北大领导权之后，《新北大》则成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公然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疯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妄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重要舆论工具。当时红极一时的“梁效”（“四人帮”通过迟群、谢静宜领导和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的许多反动文章就是首先在《新北大》刊出的。

时光流逝，而今事情过去了五十个年头。当年毛泽东主席应聂元梓的请求题写“新北大”时已年逾七旬，书写出现笔误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则真实的故事，却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做出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评论】

北大文革两派分裂，源自人心向背

——兼与官香政商榷

陈子明 林爻

近日在网刊《记忆》2016年6月30日第159期读到宫香政先生专稿《谁之过——北京大学文革前和文革中政治大分裂原因初探》（以下简称《谁之过》）。

宫香政，北大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1963级学生，文革期间曾经担任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兼西线武斗总指挥，可以算得新北大公社的校级领导成员。正常毕业分配，在河北某厂工作，1985年被划为“三种人”并被开除出党。

宫香政作为昔日新北大公社的校级领导成员，现在出来，按照自己惯有的套路和思想方法，具文对于北大文革进行了一番衍义和曲说。笔者也是文革过来人，诧异宫香政先生对于北大文革的衍义和曲说，有诸多疑问，向宫香政先生讨教。

一、《谁之过》说：“北大在文革中的分裂，主要来自于中央上层”。

妙哉此言！不妨把“北大”广义，推及全国各地、各部门乃至军队各军区、各军兵种，文革中哪里的分裂，不是“主要来自于中央上层”？《谁之过》这个断语很普适，也就等于没说。尽人皆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毛泽东首倡、中共中央决议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中共中央是上层、是顶层，何需《谁之过》鼓舌解说？

二、关于周培源先生“站在反聂的一边”

《谁之过》说：“在北大重新洗牌之际，最具影响力的是周培源副校长。他不仅是一位

著名的物理学家，还是坚决与陆平黑帮斗争的老左派。社教期间和文革初期，周与聂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对聂赞许有加。文革中，他被派往汉中分校主持工作。1967年5月，周培源回到北大，正赶上陈伯达六五讲话。他认为聂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划清界限，所以就站在反聂的一边。”

事实上，1966年12月14日，周培源出于对北大运动的关心，出于正义感和老知识分子的良知，亲自用毛笔抄写了一篇题为《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全体常委的公开信》万言大字报，公开张贴在29楼的北墙上，忠言谏论，对校文革主任聂元梓提出了善意和中肯的批评。在这篇大字报中，周培源就汉中分校的运动、聂元梓在外事工作中的表现，以及对待群众的不同态度，提出了自己一些真诚而温和的意见，以善良的愿望，希望聂元梓与校文革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十六条”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办事。在这篇大字报中，周培源还十分可贵地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六条”，明确提到了段学复、黄昆、麻子英、刘雯等人，“只是说了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应该让群众提出材料，深入辩论，作出结论。如果群众认为他们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那么就应该解放他们，对他们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让他们和群众一起参加运动，斗争黑帮。”

周培源所作所为，得人心，得分。

聂元梓此时正是上升的政治巨星，逆耳之言，触怒了这个风头一时无两、头脑急剧膨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燕园霸王。所以，周培源又被她急急忙忙遣往汉中分校“主持工作”。聂元梓拒谏饰非，失人心，失分。

从以上史实能看到一丝一毫周培源对聂元梓的“赞许有加”吗？

周培源先生1967年5月份从汉中分校回到北大，并没有“正赶上”陈伯达六·五讲话。现在我不禁要问，就算周培源先生按照你宫香政的衍义，在等着，等到六·五那天，你宫香政又是什么场合、什么安排，亲自陪同周培源先生一起听取陈伯达讲话的？周培源究竟有没有直接听陈伯达讲话？《谁之过》凭什么说得如此武断？《谁之过》进一步推想周培

源先生，“他认为聂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划清界限，所以就站在反聂的一边。”疑问又来了，周培源先生对你宫香政说过他的这种“认为”以及要采取的站边选择么？是你宫香政以己势利之心，度人之腹，把这一种因果关系，牵强附会，强加于周培源先生头上吧。

写史不是臆断臆测，句句要有根据，字字要有出处。曲解曲说要不得！

顺便提及，周培源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文革前，周先生是陆平校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陆平不是“黑帮”，周培源先生也不存在“坚决与陆平黑帮斗争”。陆平文革前，任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后，担任七机部副部长及全国政协常委，请宫香政先生摆脱文革思维，时至今日，不要一口一个“陆平黑帮”，多少还是要顾全一点我辈与师辈之间的师生体面吧。

三、《谁之过》说：“陈伯达“六·五”讲话，北大彻底分裂。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王、关、戚一手扶植起来的。”

《三国演义》第一回，劈头便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文革前，北大有十八个系，文革中，每个系的学生都一分为二。1967年8月17日，“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拉出一支号称七千人的队伍，站在“井冈山兵团”旗下，聂元梓的“一统江山”，“忽啦啦似大厦倾”。

陈伯达“六·五”讲话前，北大早已烽烟四起，八路军反王反聂孙，这时候，分得最彻底。作为北大文革过来人，笔者至今不晓“王、关、戚”何时何地何事染指（遑论“扶植”）“团零飘井红”中的哪一家、哪一个人？“团零飘井红”合成“井冈山兵团”，明明是合，怎么《谁之过》说成“彻底分裂”？“王、关、戚”和“团零飘井红”没有交集，没打过交道。“王、关、戚”和“北大井冈山”没有交集，没打过交道，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北大井冈山”没有这些高亲，也没想攀附这些高亲。

“王、关、戚”在文革中的一些言行，“违忤”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有碍“简

在帝心”对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权术平衡，他们先后遭到“高墙圈禁”。可以历数中共高级官员，文革中遭到“高墙圈禁”的，比比皆是，不必一一例举了吧。“王、关、戚”的“高墙圈禁”，更是与“北大井冈山”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四、关于形成“两大政治派别严重对立，彻底分裂”

《谁之过》说：“1967年7月11日，学部派往北大的联络员李惠国传达林杰、林聿时、周景芳的指示，要求“反对派联合起来，否则的话，聂、孙会把你们吃掉”。王恩宇又做了四点指示：（1）你们要联合起来，不要争名称，要求同存异；（2）要让周培源当一把手，理由是小将容易被打成反革命，而周培源可以与“老佛爷”（聂元梓）对抗，使组织不易搞垮；（3）对聂元梓的问题要注意，不要无限上纲；（4）要准备长期斗争。于是，反聂的群众组织在1967年8月17日召开了联合大会，按照洪涛的指示不叫“八·一七”，取名为“新北大井冈山兵团”。1967年11月28日，井冈山兵团举行欢迎仪式接纳孔繁、杨克明参加井冈山兵团，并参加总部工作。季羨林老先生也从先前支聂站到反聂阵营，戴上了红袖章，并且担任了东语系红卫兵的头头。校文革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少数同志脱离校文革，参加了井冈山兵团。

自此，在北大形成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支持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与以周培源、牛辉林为首的井冈山兵团两大政治派别严重对立的局面，彻底分裂。”

笔者曾是北大井冈山成员，从来不曾听说有什么“学部”作为上级领导机关，派什么联络员“往北大传达”什么人的指示。想必这些指示是传达给一向自命“朕即北大”的宫香政等人了吧？《谁之过》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何时何地，到底谁向谁传达谁的什么具体指示，又有什么人作为在场的证明人？这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孤证不立，《谁之过》就这么笼统含糊的说将起来，难免让人认为，是《谁之过》凭空捏造或道听途说。

这件事的涉事人员，《谁之过》一口气点名了李惠国、林杰、林聿时、周景方、王恩宇、

洪涛。据我们所知，井冈山兵团跟他们毫无联系，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时间上，则是1967年7月11日、8月17日、11月28日。《谁之过》说的“自此”，是自哪一个时间点？

拥众七千人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取名，真的是区区洪涛的指示吗？《谁之过》太信口开河了吧？

《谁之过》说季羨林老先生，“从先前支聂站到反聂阵营”，这和季羨林先生《牛棚杂忆》中他本人白纸黑字的说法绝然不同。

季羨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说道：“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有名的心狠手毒。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

季羨林先生又说：“领导新北大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

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甚麽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派在大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

了敬意的：周先生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

季羨林毫不含糊地说道：“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应该相信季羨林先生自己的白纸黑字的说法，还是听信《谁之过》胡诌八咧的所谓“季羨林支聂”？

至少应该承认，聂元梓在周培源先生那儿失去人心，失分；在季羨林先生那儿失去人心，失分。有趣的是，文革中的聂元梓，在年高德劭又敢于仗义执言的绩学之士中（如周培源、季羨林、侯仁之、周一良），一再失分；在正直淳朴的青年学子中，一再失分；在北大高级干部队伍中（如戈华、张侠），一再失分；在昔日的“左派战友”中（如杨勋、郭罗基、孔繁、杨克明），一再失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就北大这块天地说，聂元梓尽失人心，天下还能坐得稳吗？聂元梓在校内遭到这么多方面的反对，北大因拥聂和保聂而起的分裂，无疑是势在必然！

五、《谁之过》说：“1970年，牛辉林在清查

‘五·一六’中，对此有明白的交代。

当时迟群、谢静宜主政北大，作为宽大对象的牛辉林发言，坦白自己有三条罪状。一是自己由洪涛介绍加入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曾将北大的‘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他又把这份名单交给了军宣队，希望凡是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人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不要相信攻守同盟，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二是在洪涛的唆使下，在北大挑动武斗。三是说了一些关于江青同志的坏话。”

“五·一六”集团纯属子虚乌有，“清查五·一六”是一场荒唐的唐吉珂德对风车作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五一六集团都不存在，牛辉林受五一六分子唆使挑起武斗的事

情当然也根本不存在了。

牛辉林已经病故三年，他在1979年就得到了平反，现在还拿着牛辉林在“清查五·一六”逼供信条件下的只言片语，当作什么“钢鞭材料”喋喋不休地进行攻击。宫先生这样做，难免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六、关于“中央决定拔掉北大这颗钉子”

“拔掉北大这颗钉子”这个提法，来自《聂元梓回忆录》。该书251页记述：“李讷从北戴河休养回来，她告诉我，谢富治说，‘要拔掉北大这颗钉子。’这句话是六七年夏天李讷亲自对我讲的。”

《聂元梓回忆录》本身就是投机政客的翻供状，哪些内容是真，哪些是虚构，真伪莫辨，该书面世以来，一直有很大的争议。

仅以那件发生在03633班同学身上的“黑把匕首刺聂案”为例，《聂元梓回忆录》记述：“在制止武斗中我也曾受了伤，流了血。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包，我被一个叫×××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了，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来刺我是受了蒙骗。”

而所谓“刺客”在网刊《昨天》第62期揭露真相说：“这个情节，绝对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实际上，没有行刺，没有匕首、没有扎着、没有刺着、没有碰着，没有头顶受伤、没有血顺着脸往下流。聂元梓只是被器械从背后轻击，后脑勺碰破小拇手指甲那么大一点表皮而已。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这三位一体，何时、凭啥，勾兑一出‘黑把

匕首刺杀聂元梓’剧本，更加无从得知。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自我标榜‘从未进行过追究’。平心而论，1968年3月29日晚间‘谢副总理四点指示’并没有点名‘×××’。反倒是三十七年后，2005年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第270页，点了‘×××’的名，指名道姓进行诬陷。这就是伪善的聂元梓‘从未进行过追究’吗？青竹蛇儿口，黄蜂尾后针，一旦操话语，便把谎言吟。《聂元梓回忆录》是不折不扣的欺世盗名。”

时至2016年，《谁之过》说：“事实表明，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就是要利用地派院校，通过内外夹攻，挑起武斗的方式拔掉北大这颗钉子，但未能实现。”

《谁之过》如今拾取2005年海外出版《聂元梓回忆录》的牙慧，回溯演化、演化、再演化，一直演化到“举天下而奉一人”至尊的头上。《谁之过》中举证哪些事实表明文革中“中央决定拔掉北大这颗钉子”？遍阅谎言充斥的《聂元梓回忆录》，也没见“中央决定拔掉北大这颗钉子”的说法呀。《谁之过》作者须知，没有任何事实的支持，空口谰言，写史的大忌！

至于《谁之过》说：“北大这颗钉子终于被拔掉了，红卫兵运动也由此寿终。”直接把聂元梓当成了北大和红卫兵运动的化身，她一倒霉，北大就完了，全国红卫兵运动也完了，如此夸张其词、荒谬绝伦的说法，有谁能够相信？

七、关于北大3·29武斗

《谁之过》说：“3月28日晚，发生了北大井冈山的同学分别在40楼、30楼驱赶公社同学的事件。新北大公社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认为28楼和31楼是学生宿舍中心区，28楼已被井冈山兵团占领了，31楼里井冈山人员较多，他们又有武斗准备，如果井冈山兵团占据了31楼，那么就占据了北大的战略要地。所以必须奋起反击，把井冈山的同学从31楼赶出去。于是，发生了“3·28”武斗。在当晚武斗中，新北大公社的同学占领了31

楼，井冈山兵团占领了40楼。”

3·29凌晨一点左右，新北大公社武装齐备的武斗队，偷袭夜阑人静的31斋男生宿舍，发动了北大武斗，开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之先河，早有公论。此前根本没有“井冈山的同学分别在40楼、30楼驱赶公社同学”的事情。

《谁之过》承认“3月28日晚，新北大公社总部召开紧急会议”，但是回避了聂元梓对于发动武斗的拍板——“好，你们说要打，那就打吧”（见艾群文章：“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燕园风云录（四））。

校文革没有给几千人的井冈山兵团拨发一处活动场地、一分钱活动经费。28斋原来是越南留学生宿舍，越南留学生归国以后，腾出很多空置房间。井冈山兵团在28斋，广播台占用4间、总部占用4间。而不是《谁之过》说的“28楼已被井冈山兵团占领了”。

北大井冈山兵团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准备，没有应急方案。3·29事件首先是新北大公社数百名长矛队夜袭得手，顺利攻占31斋，井冈山几百名同学被公社武斗驱赶出31斋，从上到下惊慌失措、无以应对。校文革武斗总指挥高云鹏得意地大喊：“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谁之过》作者宫香政也承认，“新北大公社的同学占领了31楼”。

移时，40斋两派学生发生自发冲突，正如俞小平《记忆》第152期《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所述，40斋的冲突中，新北大公社方面落败，某团长率众二三十人被俘。40斋两派学生这场自发冲突，没有任何一方驱赶另一方，双方总部没有派员增援，甚至双方大喇叭没吭一声，也没有任何一方占领此楼。《谁之过》说“井冈山兵团占领了40楼”，是无中生有的欺世谎言！井冈山兵团没有驱赶对方同学，井冈山兵团一分钟也没占领过40斋！事实上，3·29以后不多久，40斋成为新北大公社西线武斗队驻地。

3·29清晨，按照当年节令和气温，正常人，百分之百都穿棉衣、棉猴乃至毛裤、绒裤。天亮的时候，夜间逃出31斋、衣着单薄的学生，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在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达北大之前，这些同学听到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安排意见，让大家进入32斋。在露天寒冷得不得了的学生们，一窝蜂进入32斋的楼房，各自找房间暖和暖和。没有

发生任何纷争或冲突，对立派同学平和让出 32 斋，直至工宣队进校，32 斋由井冈山兵团“割据”。

3·29 中午开始，青年工人组成的井冈山兵团“海燕战斗队”为加强总部保卫，清理 28 斋。不适宜的人员退出此楼，井冈山兵团独自占用 28 斋，成为“割据”根据地。

笔者就是 3·29 事件中，被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从 31 斋赶出去的。赤手空拳被赶出楼的好几百人，对于 3·29 事件真相，清清楚楚！

《谁之过》谩言什么“反击”，好像是先受到攻击然后反击，谁攻击你啦？妄图用今天的谎言颠倒过去的历史，这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吗？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王大宾回忆录》167 页记述谢静宜回忆 1969 年 3 月，毛泽东对聂元梓的评鉴：“你老佛爷伸手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笔者是普通群众，能够明确指出北大校文革武斗总指挥是高云鹏、新北大公社东线武斗总指挥是黄元庄、西线武斗总指挥是宫香政，还亲眼见过新北大公社总头目卢平 1968 年大夏天穿着公社武斗队标准配置的黄色军棉袄、头戴安全帽，在墙上贴黄纸红字大标语。

《谁之过》能够指出井冈山兵团有武斗队吗？如果有的话，武斗队的服装、武器配置是什么？头头姓甚名谁？

北大校文革发动 3·29 武斗的恶名，倾三江之水也洗脱不掉！新北大公社草菅人命，杀人成习，杀害了无辜青年温家驹（校外中学生）、殷文杰（路过新北大公社总部 44 斋门前的路人）、刘玮（从天津回校办分配手续的毕业生），还有肉体摧残众多干部、教师、学生的罪恶，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干净！

关于北大武斗，笔者不想跟《谁之过》多辩驳了。以下来自北大文革两派作者以及校外研究者的网络文字或公开出版物可供参考：

戈辰：北大“文革”与文革风云回忆反思

奚学瑶：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

耿天彭：耿天彭的亲历

顾仁虎：北大武斗

李竟然：北大文革武斗纪实

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

刘之新：真实的北大文革

鸣不平：我所见证的1968年北大武斗

散淡天涯：北大“3·29”武斗印象

舒声：试析北大武斗的背景与内因

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田健行：武斗杂忆

余习广：北京大学六八年三次大规模武斗

张曼平：北大武斗期间死亡事件真相探究

唐利：我的北大文革记忆

樊能廷：北大“刺聂”真相

薄亚达：“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

薄亚达：专制政客的翻供状

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

八、结语

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

二十年来陆陆续续出现许多文革回忆、研究，其中一些总是倾向在叙述事件时，加一个谁谁受某某支持，意欲先给事件定性。或者断章取义的选取昔时领导人的几句话，用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这种做法，是阉割历史，或是选择性地解说历史。《谁之过》东鳞西爪，穿凿附会，严重地具有这种弊病！作者不如一五一十，讲讲亲历的北大文革事情，其实更有意义。

北大文革两派斗争，其重要表征，始终围绕反聂和保聂展开，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义。聂元梓原为官身，按照北大哲学系62级毕业生、著名作家周国平先生说法，是“传统内”的，如果不是金光闪闪“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罩着，文革运动一起来，她就可能被扫进“走资派”队伍。这张大字报使得她一炮走红，成为天字第一号“左派”，顺利通过选举，成为“校文革红色政权”执柄人。

必须承认，校文革是政权，但是也要看到，这个政权不脱窠臼、原封不动接手了陆平校党委的权柄（党政财文包括武装部、保卫组），统治手段难免落窠于以我为中心和阶级斗争为纲。加之，聂元梓量狭无文，悞谏贼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校内，大搞以聂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渊驱鱼，把一批批同路人推向对立面，导致众叛亲离。在校外，到处伸手，争权夺势，四面树敌，遭到千夫所指。通观全国文革乱局，上下交困，左支右绌，何尝不是：治世无真贤，治病无良医！全国如此，北大能怎样？

最后，笔者希望宫香政先生在分析北大文革的时候，从内部找问题，北大文革反聂保聂两派分裂，源自北大人的人心向背。如果不分析内因，只从外部找问题，那就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了。 ■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一）

——狂潮骤起

陆伟国¹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1962级学生。现作为一个当年的普通学生、一个普通红卫兵，将这段特殊岁月的回忆写下。

一. 狂潮骤起

1. 大字报

随着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革命的气氛一下就沸腾了，我们就像掉进了一口翻滚喧嚣的大锅。整个校园是一派极左势力所津津乐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景象：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是各种各样关于领导人和国家大事的以往小小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有影没影的传言；到处是兴奋的人群，真的以为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了。学生们纷纷从北校门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听站在板凳上谁都可以表演一番的即兴演讲。有的老师还在校门口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不要去啊，不要忘了1957年的教训啊。

关于这张大字报之前的背景是，北大是当时事业单位社教运动的试点，这期间作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与校领导陆平等发生矛盾。从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队进校，直到1966年1月在国际饭店勉强结束，也没解决。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出中共中央理论小组北大调查组，组长是康生老婆、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曹轶欧。聂在曹的肯定与支持下，于5月25日下午2点在北大大饭厅东墙贴出了这张大字报。康生获知后，

¹ 本文作者后为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已退休）。

派人专程将该大字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立刻在大字报上做了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面对渐渐决口的堤坝，系里传达了市委的精神，要同学们“心要热，头要冷”，就是既要有革命热情，又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轻信，不要受蛊惑，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要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些话，本身都是对的，我是听进去了，以至于有江青、康生这些人出席的北大、北师大的大会也没有去。而老师的这些话，后来就成了压制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也有同学表现出了与往常不一样的热情。因为系里不提倡大家去外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就有些犹豫了。这时，有位平常挺沉稳的同学起来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使大家感到有些突然。这大概是革命的浪潮，已经涌进了他的心里。

那些天，我们倒是很正常地去临近的各高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还很认真地拿着本子记，一天差不多就能记一本。内容大多是批判邓拓（人民日报总编、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三家村札记”（那是他们三人在《前线》杂志上合作搞的一个针贬时弊的专栏，被极左势力选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突破口，与此相连的还有邓拓在《北京晚报》上的“燕山夜话”等）以及他们本校的一些事情，也渐渐地有一些涉及北京市委、中宣部这些。尤其是6月2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欢呼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把北大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党”，号召革命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这些话，在当时把我们“彻底”地震惊了。解放都十七年了，怎么又冒出来“假共产党”了呢？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啊！尽管这些事，与后来的大事情不能相比，但在当时也是足够的震撼了。

夜里也歇不着，躺在铺上谈论着白天的见闻，也热烈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比如

工作组该不该派、该不该留。虽然讨论这些问题，很快就被证实是太小儿科、太幼稚了，但还是认真地讨论着，那可是在关心国家大事啊。那些时日，整天屁颠颠地跑来跑去，不用上课，不用考试，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无关自己的痛痒，身边也还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事，甚至是觉得有种热闹的气氛。马克思说，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节日？大家还真以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来到了。就像前不久一位台湾友人跟我说，那时他还是个中学生，听说大陆发生了文革，又不用上课，又能打老师，真有意思。大家的理解都还很天真。

在有大字报之前，大家都写过一些批判稿，批判三家村，批判旧市委，批判校领导，有的在班上交流，有的交给老师。我写了份批判稿，最后难免要写几句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有位老师看了后，把它划掉了，说是没那么严重吧。其实这两句口号不是我发明的，当时已经有了。这位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也可能是注意到了但不赞同。一个月之后，当运动更激烈、斗争更严酷，批判稿变成了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领导干部和老师们被纷纷拉出来批斗时，有同学想起了这件事，说那个老师至少是在压制革命。我忙说，大字报上这两个口号都有，没划掉，让这位老师少了个事。

然而没几天，批判的对象就从北京市委、中宣部、教育部往下延伸，指向了学校，指向了系，甚至指向了老师。为了表示我们也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也为了帮自己的老师过这一关，我们班也在新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组织了对辅导员和系办几位秘书的批判会。同学们一个个走上讲台“义正词严”。我也发了言。发言前，对那发言稿是字斟句酌，讲重了，怕伤害到老师；讲轻了，又怕说是“走过场”。会上，老师们也心领神会，很是配合，一个个表示要“认真改正”。会议结束时，我们请老师们先走。老师们也对我们连连点头。低年级的学生要厉害一点，63级的辅导员邵汉青老师身怀六甲，也照样站在教室里被同学批判。当然，比起中学生对老师的批斗，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人大校内大量出现大字报是在5月24日，比聂元梓的那张还要早一天，主要是针对北京市委、中宣部的。针对本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是6月4日罗肇鸿写的，题目是“向



我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开火”。但比较有影响的则是哲学系教师姚中原6月7日贴出的大字报。但分歧也就开始出现。6月14日，函授学院的徐一杰等五人贴了批判我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大字报。结果，第二天他们几个就被保郭的人拖出来斗了。还要往前算的话，6月2日，在苏家坨前沙涧的哲学系11名学生最先贴过。因为远在郊外农村，当时校内并不知道。

（上图：1966年6月15日的批斗会）光看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行啊。怎么显示自己也投身政治运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呢？同学们也开始写大字报。写什么呢？怎么写呢？这是贴出去给大家看的，比起教室里关起门来的发言，就更得慎重了。既要表现出革命的“战斗力”，又不能真的伤了老师，真的是又一番搜肠刮肚、费尽思量。这类为了应时应景的大字报，当时也是占了一大部分的，明眼人都（上图：我系同学贴的大字报）能看得出来。



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写毛笔对很多人是个难事。但对我倒不算什么。因为我把毛笔当钢笔写，也不抬胳膊，所以速度比较快，还帮过不少人抄写。

我自己也给系里的戈泊老师写了份大字报，长达七页，对他早年的一篇在苏联留学时的副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批判”，但没有任何政治性帽子。

因为带有点“学术性”，班里同学还说写得不错。戈老师是我们很多同学当时难得有的“偶像”，留苏高材生，英俊魁梧，还会唱一手好歌。后来有次旅途中偶遇戈老师，我提起了这件事，说：“真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写了你的大字报”。戈老师笑笑说：“是吗？我怎么没见过？”或许，他是不想叫我还把这事放在心上；或许，也可能真的没见到。因为那时大字报比现在网上的发帖跟帖还要多，有的不到一小时就被新的覆盖上了。所以，有的还特地注上“请保留三小时、四小时”之类的字样。没有点“要命”的内容，是注意不到的。当然，我今天仍然要为此向戈老师表示真诚的歉意，因为这毕竟不是开玩笑。

2. 新市委

极左势力不会让运动就这么温良恭俭让地走下去。渐渐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一个大事，是五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知道的时候已是6月4日，报上公布了那次会议上决定的改组北京市委的名单，成立了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新市委。六月中，北京新市委向各单位传达了也是那次会议上作出的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这被称之为文革的第一战役，之前的批判“三家村”还算不上。

听了这个，才知道天色真的变暗了。心里一方面觉得事情重大，另一方面又是疑虑重重。这么多的干了几十年的党的高层领导，怎么会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呢？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如果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又何必要等到让革命成功以后再去做破坏呢？又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窃取高位”，那革命队伍里的别人是在干什么吃的呢？党的组织几十年来是怎么考察自己的干部呢？又不是像小偷悄悄地藏个东西，不让别人知道。这毕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

尤其是传达林彪的“5·18政变讲话”，不由让人心头一怔。林彪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喊叫：“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林彪还指名道姓地说：“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言语之间，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政治局势都到了这种危急恐怖的地步啦？不敢信，更不敢问。他的意图就是唬得大家只能紧跟着他们“干革命”，誓死保卫这个，誓死保卫那个，什么也不要问。再没有前些天看热闹的心情了。心里只觉得很沉重，很担忧，我们国家要出大事情了。

五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特地亲自加上了几段，其中最后一段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文件，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有三个大动作。一是1965年底在上海由江青策动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这是个信号弹。但发现各地、尤其是北京没动。第二个动作，就是这次五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重头戏，包括撤消“二月提纲”，包括制定“五一六通知”，包括改组北京市委，包括抛出彭罗陆杨，包括重新组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也包括在这个时间要求广播聂的大字报。这是下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攻令。还觉得各地动得不够，第三个动作就是八月份掀起红卫兵运动，和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亲自率队去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城墙。

有人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有的说，是从六月一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从群众的直接感受来讲，是那一天。有的说，应从五月十六日算起。还有说是

在更早。应该说，“文革”是有个分为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如果实在要说是从哪天开始，我觉得，相对来说，以五月十六日为宜。

其实，文化大革命这个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名不副实。就运动范围而言，它并不只是文化领域的革命。毛泽东已经感到仅仅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三家村”、杨献珍、孙冶方这些，已经不能解决他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才发动这场涉及党和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大革命”。从运动的手段来说，它实在不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武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尊敬的校长郭影秋，5月19日也被任命为新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兼原职）并代表华北局列席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在人大的职务仍然保留。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的位置也更加突出。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孙泱主持。6月2日，郭影秋又被任命为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前，郭影秋是人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因年事已高，由郭影秋实际主持工作。

可是没多少日子，便又来了个谁也想不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新市委也不新了。郭影秋在这个位子上才干了两个月，就被撤职。其原因是，康生一开始对郭是抱有希望的，但是郭影秋明显不愿意追随极左势力而被打倒。那个新市委的一把手李雪峰也在不久后的8月16日被罢了官，后来又因林彪事件被开除了党籍。

6月18日，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

潘多拉魔盒被无可挽回地打开了，被放出来的极左妖魔就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到处猖獗，而无人可以制止。■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六）

——我成了“清队”对象

宋翔雁

一. 银行不让我取钱

随着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中央夺权——已经完成。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三重罪名被永远清除出党，林彪被正式指定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为了让人民承认、接受并巩固这一胜利成果，在全国范围内还要继续清算、肃清刘少奇的影响，并挖出其在党内的党羽和持有异议的民间人士。

在此形势下，地院工、军宣队于68年11月以全院大会各学生班级大联合成果介绍的方式，“含蓄地”宣布地院已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所谓的整风就宣告结束了。此后，一方面需要按中央的统一部署，着手处理各届在校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将高校内的学生分配问题作一了断；另一方面则将工作重点转向对教职工队伍的清理。前者可依靠学校人事、政工系统的工作人员来完成，而后者则成为宣传队自身的工作重点了。

就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间，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即大约在十月中下旬的一个星期天，我去王府井大街北口东侧中国人民银行储蓄所取我一笔到期的存款。当我填好取款单并和存折一并交给柜台的工作人员后，她问我你都取了？我回答道：连利息一起都取了。她让我等一下就起身去到后边的办公区。我在窗口等了比较长的时间后，她与一名年岁较大的女工作人员（我估计是该所的一名负责人吧）一起来到柜台，并问我：这是你的存折吗？我回答后，她又继续问道：你有证件吗？我边问：现在取钱还需要证件吗？边将自己的工作证掏给了她。她拿过我给她的证件看了一下后又说：

你等一下。说完就转身又回到后边的办公区去了。

这事当时搞得我一头雾水，从来银行标榜的都是“存款自愿，取款自由。”而且一直以来我从未听说取款还需要查看证件的事！正当我纳闷时，偶然抬头张望看到墙壁上“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标语照旧堂而皇之的贴在储蓄所的墙壁上，真是绝妙的讽刺！既让我不解，又令我气愤和无奈，只能乖乖地等该女性出来后给我一个说法了。

等了大约有十几分钟后（六十年代时，银行业务量都不大，一般存取款业务几分钟内即可完成，等十几分钟的事可属罕见），终于看到那名看似领导的工作人员出来了。她对我说：这钱今天你还不能取，需回单位开个证明后再来取（六十年代末国内尚无电脑、网络，人们在银行的那个店铺存的钱，只能还在那个店铺提取）。我问她为什么要开证明，开什么样的证明？她回答道：这是新规定，证明这笔款是你的，可以提取。当时我并不清楚此事的原因，但当时的政治态势下，我也不想与之争辩，只能拿了我的证件和存折回家。

二. 宣传队让我老实交待

第二天周一上班我就先去教研室打了招呼，然后去系办，说明昨天在王府井银行取钱时，对方要求我回校开取证明的事，并给他们看了我的存折。当时系办由张有容老师负责，听后他说：我们从来没开过这种证明，等我问问院里，再给你答复。工间操时张老师到教研室找我并告知：院里也说从未开过这类证明，不知有什么新规定还需请示，并让我别急，同时还问我是否等钱用？我回答道：我并不着急，只是钱到期（已过期几天）了，我取出来想换到五道口银行改存活期，这样也近些，存取方便。因为昭明的预产期十二月中下旬，此前还需买些分娩前后母婴需用的东西。说毕，张老师再次嘱我别着急，他会尽快去沟通问清楚的，对此我向他表示了感谢。

没想到的是，当天中午在教工食堂前的大字报栏上就贴出了7165级的一张大字报，质问我为什么要取钱，哪来的那么多钱，令我老实交待！对这张大字报我真有些“莫名其妙”

之感，但我深知此事与张有容老师毫无关系，纯属一些想整我在千方百计地找茬儿，我当冷静面对，先静观事态如何演进再说，不必急于回答。

当日晚饭后有一学生来家叫我去教研室回答大字报的提问，我应召前往。到教研室后看到除五、六名 7165 级的学生外，还有参与教研室领导运动的军宣队人员叶××（一名连级干事，是教研室核心组的成员。平常他在教研室的会上极少讲话，也可能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或因稍有口音不愿讲话。但他有点艺术细胞，经常可以看到他给一些制作歌颂毛主席作品的老师作指导或代为修改），没有任何老师包括核心组的老师在场。因此让我意识到，这是军宣队牵头而让学生们出面对我取钱的事进行“开审”。叶××见我到后还是比较客气地让我坐下，并接着问道：学生给你贴的大字报你看到了吗？我做了肯定地回答后，他又继续说道：那你就把他们提出的问题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清楚吧！面对这种提审的方式，我内心是很反感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而且又完全是自己私人的事情，我又没偷没抢，也非非法收入，学生不懂政策，难道军宣队也不懂得？！

我从银行让我开证明时就意识到绝非个别人的胡作非为，肯定有相当的背景，只不过我不知道罢了。因此尽管内心反感，我还是用比较平和的口气，将我在系办与张有容老师谈为何去取钱的话重复了一遍，至于哪来那么多钱的问题，我明确而沉稳地向学生们说道：除了我个人的工资之外，我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存折里的钱都是我劳动所得的节余部分，因我成家前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如俗话说说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平时自己也比较节俭，再加上“四清”一年的开销更少，三年前积攒下来的，都存在银行里了。

面对我的回答，学生们一方面似乎觉得所言属实也有道理；但好像还不大愿意就此放过，故又有学生问道：你为什么现在取钱，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很多有问题的人都到银行去取钱？我回答道：你说的情况我前段时间在大字报中看到了，是揭发×××（当时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好像是一位系处级的女领导，但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去银行大额取钱的事情。但我的情况与她不同，因一方面我的三年期存款刚刚到期（已过了四、五天了），需要去银行办理手续；此外，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家中确实需要添置一些东西，要用点

钱。更重要的是要把存款地点改到五道口办事处来，这样离家近点，今后存取会更方便。

至此，学生们再未提出问题，彼此交换了会儿意见后，叶代表对我说道：今天对你的提问就到这里，以后有需要时，还会找你的，要有思想准备。现在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了，每个人在运动中都要接受群众和组织的审查，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叶代表的简短小结可谓滴水不漏，既把非法“提审”干预公民个人权益的违法行为，说成为“每个人在运动中都要接受群众和组织的审查”，又提醒了被审查者应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和接受这类审查。从叶代表的小结中也间接地能辨别出他的言外之意是：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我已被定为审查对象了！看来新的厄运又将开始，这将不以我的意愿为转移，只能做好精神准备，真的需要“正确对待”了。

现在想想，共产党接管政权迄今已六十六年有余，仅在毛泽东主政的二十七年里，所进行的各类运动我能说的上来的就有：土改、镇反、思想改造、高饶反党集团、肃反、合作化、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反修、文革等达十一次之多。运动的频度已接近每两年半搞一次，近乎达到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提出的今后每两年要搞一次文革运动的要求。而每次运动经历的时间（跨度），少则数十天，多则几个月到一两年，更有甚者，文革运动历时十年有余！

由此可以看出，表面上看是两年多搞一次运动，实际几乎是一个运动刚搞完，另一场运动又粉墨登场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每次运动中都会有一批人（或党内、或党外；或多、或少；而且有一定比率要求）会以各种不同的名目受到审查，并被处理。此外，每次运动，都会部分停工、停产、停课，或占用工余、课余时间超时进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的损失和干扰。在共产党领导下这类人与人斗的内耗，其残忍程度，对国家和百姓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华大地有史以来之最吧！我多么渴望，在当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许诺下，能责成国家的权威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对二十七年来历次运动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做出一个科学而权威的真实统计，并公

之于众，以警示执政党自己和国人，确保今后再也不犯此类过失（实为罪行）了。

“提审”后两三天，张有容老师找到我说：没事啦，你就直接去取钱。不用开证明，学校也没法开这种证明。都是银行自己在哪儿瞎胡搞，乱弹琴！说毕我向他讲述了学生“提审”的事，他笑笑摇摇头，嘟哝了一句“瞎搅合”就走了！

这笔钱事后我也没有时间去取或办续存手续，因一方面手头的钱还够，而且进入69年后，我一直忙于应付，真没时间进城去办此事。直到70年4月，因孩子在京被烫伤住院救治，昭明回京料理时，才将这笔款（近八百元）全额取出都交给了儿童医院，但作为孩子的救治费用还不够（因我们当时去五七干校时，孩子还不足一岁，故未随行。为此，学校强行终止了职工子女医疗统筹的政策照顾，故全部医疗费用均需自己承担。这就是地质学院工、军宣队对待广大职工施行的非人性的铁腕政策的一个侧面缩影），不足的部分还是由我姐姐垫付的。

回忆写到此时我心潮激荡，愧疚万千，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这是因为事后我忘记了应将姐姐垫付的欠款及时奉还，尽管她不会在意也并不缺钱。但这样做却能显示出我已真正懂事，不再像以往总让她惦记和担心了。她疼我、爱我，关心我的家庭，疼爱她的侄子。若非她坚持让照看孩子的阿姨将孩子马上送医院，并陪同前往就医检查，当确诊为烫伤处已因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导致急性败血症，北医三院因无有效药救治已拒收时，是我姐坚持再送北京儿童医院，在使用当时的新药红霉素后，孩子才得救。否则，我儿子的小命就会因阿姨的隐瞒和耽搁而送命了！如今我姐离我而去已近二十载，我只能写下这几个字，以此寄托我们全家人对她的思念和感恩吧！

三. 房管局出租了岳母的房子

进入69年后，我心里最着急的是二月中下旬昭明就将分娩，如何安置才能让她产后得到很好的休息，以保证母子的身体健康。因为此时她娘家自住房的产权在文革之初已“自

愿”交公，房产改由房管部门管理。但在文革的特殊政治形势下，房管部门根本不考虑该住房是老人将自己的私房产权无偿交公后，再改为自己租用的事实。房产上交后不久，他们就来人以在册户口人数过少为由（当时只有我岳母和他的孙子两人户口在册），通知老人住房面积超标，必须调整。并以照顾不迁址的美言，强令老人家退出她原住的两间正房，迁入另一间主房和一间厨卫合一的房间居住。但因居室面积骤然减小一半以上，家具、钢琴（是老人婚配时的嫁妆，后来成为昭明的心爱之物，55年报考大学时她一度曾想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等杂物实在无法安置。在这种情况下，房管部门同意，将钢琴等放不下的东西，暂时寄存在已腾出的两间住房内，待全部物件处置后，再将空房交由房管部门管理。就这样，一位来自农村本人是中农成分的无业老人（当时已近七十高龄），就因为其丈夫被诬为反革命而几乎被扫地出门！

有必要介绍一下昭明的父亲刘锡嘏先生。他是1923年清华学堂毕业生，毕业后以庚子赔款保送去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学土木工程专业。学成后，于1928年回国，解放前就职于开滦煤矿任总工程师。为确保开滦煤矿进出口海运的需要，整座秦皇岛市从渔村变成了一座设施完备的海港城市。在秦皇岛的历史变迁中，从刚去最初的选址踏勘，再到城市和港区的地质地形勘测、市区和港区的勘察设计、城市和港区码头规划和设计、一直到建设施工的全过程，都是在他一手负责下完成的。为了保证港口码头的选址正确，他甚至身着潜水服潜至海底，观测海流不同季节的变化，补取海底岩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对秦皇岛市耸立在神州大地的渤海湾畔，是居功至伟的！但解放后，在开滦煤矿总经理为推诿己罪——令刘锡嘏将秦皇岛港口水深航道图带到天津开滦总部，面交美军并作说明。从而促使蒋军很快经由秦皇岛港登陆，开赴并占领东北——的诬告下，一个无党无派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此竟被判定为反革命罪，险被枪决。但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后又改为15年监禁而监外执行，以便利用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继续为秦皇岛市和北戴河的建设和服务。他于1964年由于立功表现，被提前两年释放，在秦皇岛市建设局工作到1974年退休。最终历史宣告刘锡嘏无罪，他老人家终于在1980年

去世后获得平反。

随着堆放的东西逐渐清理，钢琴则被抄走（落实政策时，得知钢琴被中国芭蕾舞剧院占用），大约到66年10月，那两间住房就全部腾空，交给房管部门。这时，在同院住户王淑兰的暗中窜夺下，大约在67年春，房管所就将此房改租给王淑兰住了。这种无偿剥夺私人房产，还要下狠手砍上一刀，削减老人一半以上的住房面积的恶劣行径，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大约也算前无古人了吧。由此，昭明产后就不可能再回娘家居住了。为此，我只好与我中学时好友的母亲商量，看看她老人家有无可能帮我一个忙。幸运的是老人家毫不犹豫地答应帮我，同意让昭明产后搬到她那儿与她同住，并帮忙照顾昭明坐好月子。这样我心中的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

孩子于二月中春节前降生了，尽管难产，大人受了很大的罪，但母子均还平安，这就算万幸了（因属大龄产妇，又处于管理比较不规范的文革年代）！出院后，昭明在我同学母亲家住了一个月。一切还比较顺利，母子休息也还可以。但因昭明不太习惯让她不大熟悉的老人照料，觉得于心不忍，所以精神上总有些紧张、不自在，从而对她的休息多少有些影响。所以孩子满月后，他们母子还是搬回了娘家，挤在厨卫同室的小间屋内，白天请一名阿姨来家照料孩子。直至昭明产假结束后（困难产，产假比顺产多10—15天），她回校“上班”（实则除搞运动开会外，主要是在学校机工厂的车床上干活，生产掘进教研室研制的钎头库体），孩子仍留在姥姥家，由阿姨照应。

四. 拳打恶邻

上述经房管部门帮忙逼我岳母退租了两间住房后，她自己得以入住的邻居，自从昭明母子回娘家暂住后，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经常让她的孩子们敲打墙壁、窗户（老人被迫腾出三间主房中的两间后，房管部门在其间打了隔断，壁厚很薄，所以敲打时响声很大墙壁震颤的也很厉害），吵得孩子经常被吓醒而哭闹，同时也影响大人休息。为此，我回家之后，

曾过去跟新邻居的主妇（王淑兰）很客气地打了招呼：希望她能让自己的孩子们注意不要老敲打隔墙墙壁，因我们的孩子刚出满月，经常被吓醒后啼哭不止，望能体谅！

但打招呼后毫无效果，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原打算还是回到学校去住，我争取到教研室的实验室暂住一段时间。回校后，我将家中的情况向教研室领导作了汇报，并提出想暂时到实习室住一段时间的想法。但领导面有难色地和我谈，因半工半读教研室是66年初刚组建的，探工系的所有实验室仍归原全日制教研室管理，复课期间少量的实习课也需经他们来安排，以不妨碍全日制班级的教学活动为主。所以我们有难处，不好答应你！看来领导也并非不给我面子，情况也确实如此，不好让领导为难了。后来我与昭明相商，决定先凑合一下，等天气再暖和点后，孩子就可以搬到厨卫合一的房间居住（因此房间较凉），他们再吵时的影响就会小很多了。

但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五一”放假期间，我回岳母家帮忙将取暖煤炉和烟筒拆除后搬到四合院的院子里，然后再拿到街门外的胡同里清除烟筒里的煤灰。当我在院门外胡同拐角处每清完一根烟筒后，就先将清好的烟筒送回院内姥姥住房的窗跟儿下面，再拿一节没清过的烟筒出去继续清理。往复几次清理后，当我把最后一节烟筒清理完毕带回院子时，发现原已清好并堆放在窗跟儿下的烟筒几乎均被踩扁，散落在房门门口。面对这种欺人太甚的恶劣行为，我真是气极了。但我还是压着内心的火气，对正在院内晾晒被子的邻居主妇问道：老王，这烟筒是谁给踩扁的？她竟回答道：我怎么知道！我接着问道：我进进出出，每次均看你在院内晾晒被子，你怎能不知道呢？何况，我把烟筒堆放在他姥姥住房的窗跟儿下，对你晾晒东西也不碍事呀！对我的质询她气急败坏地吼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啦！这时，她老公（柴××，是北京公交部门的司机，转业军人）手握一根一米五左右的长木棍，从屋内冲到我面前喊道：嘿，干嘛，你想打架呀？！面对来者的蛮横架势，我冷冷地道：柴师傅，您这是说啥呢？我是好言问您爱人是谁把我们家的烟筒踩扁了，那来打架的事！面对我的回答，他一时不好发作，拿着棍子的手也放下了。这时我看见他们家又出来一名年轻女性，一手拿了把菜刀，另一手提楼一把拖布从住房里走出来，并将菜刀

交给了王淑兰。看到这架势，我知道是祸躲不过，要动真格的，就得做好心理准备！面对这三个人，我毫无畏惧，而且我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要想制止这场恶斗，就必需先制服姓柴的，不能去和女人斗！因我知道柴某是复转军人，若是步兵，手中又握有棍子，若使起枪刺动作，还真不好对付。但他是名司机，估计很可能是汽车兵复原的，即使会使枪刺，水平可能也有限。自己先别心虚，只要能近身，我还真的不怕（因我初中时参加过拳击训练，懂得一点格斗和近身防卫的技巧），而且近身后，棍子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总之，只要他不擅长枪刺格斗，我就有绝对把握拿下他。当他也看到他老伴和另一女性也手持器械站在院内时，底气好像又足了，说道：她已经说了不知道，你还缠着她不是想打架是干啥？边说又迈了一大步，与我的距离已经不足一米五了，而且两个女人也围拢过来，我近乎被围在中间。这时我挪动了一下双脚的位置，斜身保持着对柴某的最佳占位，同时，因我这时看到一位街道办的女性刚从北屋出来，就放声对他们喊道：你们别想动粗斗狠，那是犯法的，街道的人也在可以评评理。若要动粗我接着，绝不客气！这时只见街道办的人慢慢移步站到晾晒的被子后边，想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而柴某则慢慢挺起胸部，看来是欲挥棒打人了。这时我想机会到了，一则他不会（或不善）枪刺，我无忧了；二则，只要你挥棒，我既不躲也不挡，立马纵步近身，挥拳猛击面部打你个满脸花，让你啥也看不清，拿住后，让两个女的罢手就没问题了。事情的进展完全与我一闪而过的预案一致，对方是仰身挥棒横扫打向我的上身，我则纵步一拳猛击对方正面偏左的鼻口眼的交汇处，柴某一个踉跄差点跌倒，满脸是血，棍棒也丢失一边了。这时两个女的也傻眼了，又哭又喊地对街道办的人说：他打人了打人了。这时我也看清楚街道办的人已经从晾晒的被子后边走出来了，同时我也看到王淑兰手中仍拿着把菜刀。所以我立即朝街道办的女同志走去，并指着王手中的菜刀说道：同志，您也看到了，事情不是我引起的。柴师傅打人在先，王淑兰还拿着菜刀，我不得不自卫。街道办的人明知我说的是实情，但在什么时候都以阶级路线为前提，不能只看事实。所以她只能避开实情说道：你看，你把人打得满脸是血，先处理一下，然后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再谈。当柴某处理完面部的血迹后，我们一起去到派出所。

街道办的人先在另一间屋里将情况与派出所的人讲了（估计讲的还是实事求是的），后来派出所的人让我们各自讲明了情况后，同样不依事实真相处理，而以和稀泥的态度说道：你们打架是不对的，以后不能这样。柴师傅出了不少血、牙也掉了一颗。因伤的治疗费用和误工费用，要由你承担。这一处理意见显然不公，而且烟筒被毁的事只字未提。但那个时代，哪有什么公道可言。所以面对柴某不敢再提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只能吃个哑巴亏吧！

五. 惹不起，躲得起

事毕回到岳母家中先将在派出所的情况说明后，我匆匆将散落在院子里的已经不能再用的瘪烟筒收拾起来，将仅余的两三节能用的用废纸张包起来存放在室内。回屋后，昭明对我说当时她的双腿已经吓得都站不住了，姥姥也非常担心。对此我只能好言安慰一番，并告诉他们我现在的想法。我说：回校后立即将今天发生的情况向系里如实汇报，这样可以避免他们恶人先告状，让我们处于被动解释的地位。二是，老柴家这回吃了点苦头，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不断找茬儿，欺负老人和孩子。所以，今后继续住在这里对姥姥、小益——昭明侄子和儿子的安全都不利。我想将这一情况向学校领导说明白，请学校行政部门看看校内职工是否有人愿意换房住到城里，因为姥姥家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市内最好的地段了（东城灯市口东），看看有无可能帮忙了解和协助调整一下。因为这涉及到职工及家属的人身安全问题，我估计也许会引起领导重视的。昭明同意我的意见，对我的想法老人也丝毫没有故地之恋，完全同意。我岳母是一位极其理智的老人，尽管她只上过四年私塾，但遇事孰轻孰重，她内心却明镜似的。如“红八月”期间经历了红卫兵的查抄、罚跪、抽打后，对这些非人性的野蛮行为，她没有畏惧，也没有逃避。事毕，她老人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好家中全部细软、现金存折和房契、地契（文革之前，私人房产包含房产和地产两部分，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房产税和地产税。但随着土地收归国有政策的

执行，地产部分实际上就等于被国家无偿没收了)，然后亲自送到街道办事处上缴。她内心深处担心的不是自家的钱财，她说过，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她老人家担心的只有她已经辛辛苦苦带了近十年的长孙，希望她孙子能有一个既有安全保障，又不会受到歧视的生活、学习环境（“红八月”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孙子不敢去上学，因在路上经常被同行的“红小兵”打骂，在学校里红小兵们不愿和他玩，他自己对红小兵的“神气”劲儿，既羡慕又自卑——事实上孩子父母都是解放后上的大学，当时都是沈阳医学院的老师和大夫，但就因为他爷爷的问题而受牵连。为此老人只能自己亲自接送孙子上下学，尽管她本人还是缠过足的小脚，每次接送要走很长的路，但老人都咬牙挺过来了)。她老人家的这段经历都是我婚后才知晓的，这一切令我感触不已，直到现在，我都很难想象，对这样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老者，当初需要何等坚强的信念方能走过来呀！？

回校后，我立即将在岳母家和邻居争执、打架一事的前因后果向系里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为防止邻居挑衅、报复，希望能请学校行政部门协助和帮助我们解决一下换房问题。对我的汇报系里未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对我打人的事提出批评，也就是说对事件的是与非未作明确的表态。但对协助换房一事，却一方面让我去找相关部门联系，另一方面也说他们会就此事和行政部门打个招呼，请他们帮助解决。

汇报后，我立即到院行政处联系，并向他们简要的说明了希望学校协助换房的原因。行政处表示探工系已打过招呼，但他们需要与房管科的人一起摸一下情况，然后再看有无可能。而且表示他们会抓紧时间处理的。

因那时我的心情异乎寻常的紧张，故当时系和行政处是谁接待我的，以及当时的场景，现在竟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他们在那个年代能理解我们当时的困境和急迫感，我和家人是永远记得并感激他的。如果他们至今依然健在，就请接受远在万里之遥的我和我的家庭对他们的真诚祝福和由衷的敬意吧！

为了防止对方报复，我和昭明决定，我每天回家过夜，以便让老人能够安心，若有情况，也好应对。昭明虽同意，但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遇事一定冷静，即便吃点亏，也不要

引发正面冲突。对此我表示一定遵从。

大约三、四天后，房管科的人就给我带来了消息。说有一实验员奚××，现住着三楼316房间，有意换到城里住，但要看看房子再定。他也向我介绍了奚的住房情况，说她与另一家共住一套四居室的房子，她本人住一大一小，居室面积共20平米多点。你们可以先互相看看，若双方同意，就可来办换房手续。并告知她一般五点以后就会在家。这一消息令我异常高兴，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我和昭明就前往联系。见面后，昭明向她介绍了她母亲住房的情况，她表示想去看房后，又定下了第二天一同去看房的时间。同时她也让我们看了一下她的住房情况。回家后我们觉得房子还算可以（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房管科尽管帮了我们的忙，但也打下了他们自个儿的埋伏，最终出于安全和老人为确保孙子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考虑，我们也只能依从、就范。这是后话），只是住在三层，姥姥是否能够适应，还需要与她老人家商议后，再做决定。第二天如约带奚某两口子一同去看房，看毕他们对房子本身和住处环境均很满意，表示只要我们同意，就可以立即办理换房手续。我们也告诉她，因她家住三层，老人能否适应，需听听她的想法，若老人同意，我们明天就会告之，并抓紧办理手续。送走奚某夫妇后，我们又与姥姥仔细商量很久。姥姥明知上下三楼对他这样一位缠足老人是十分困难的，但她心中从来没有自己，一生心中所想的都是子女，而今又转到了孙辈的前程，令人可敬可亲。商量时老人反复说：换房很不易，就这样吧。上下楼难，我慢慢练着，还是孙子们安生要紧！看到老人的坚定态度，而且这时小益听说要搬到地质学院去住和上学，高兴得不得了（因他小时暑假曾在昭明宿舍住过，喜欢那儿的环境）。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小益已快十一岁，他也能帮奶奶外出买些东西了，所以也就下决心同意与奚某换房了。

当换房手续办好后，如何搬家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家中有老有小，昭明产后的恢复也不理想，而且当时我正面临军宣队对我进行审查的时刻，找谁帮我确实是个难题。如今已记不清学生们是怎么得知我要搬家的，但大家对我们的那份关心和帮助，至今却记忆犹新。记得当时7162的白秀春、7163的王文翰等部分学生向我表示，他们可以组织同学来帮我，

让我放心。白秀春甚至气愤地说，我在城里找一帮中学红卫兵，去他们家（指王淑兰），看他们谁还敢欺负人！对他们的直率和热心我表示由衷地感激，但对他们想打抱不平的激愤，我则非常担心地对白秀春说：你可千万别惹事，你真这样非但不是帮我，反倒会把我放到了蒙骗你们搞阶级报复的危险境地，到那时真是百口难辩了！我心领你们的情谊，但千万听我一劝。白秀春是一个讲义气的孩子，是北京地区的考生。67年夏，学校邀请解放军来院表演潜水囚渡等军事游泳课目，让我开摩托带他去玉泉山那边解放军某部联系接洽，经过那段时间的相处，彼此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了。毕业后他分在山西冶金系统，后还多次到学校来看望过我们。可惜因身体原因，在90年代中后期就过早谢世了。

有了学生的帮助我就不急了，很快与奚某定好了同时搬家的细节，顺利地将我岳母从住了22年的故居搬入了地院。老人在地院住了八年多，于1977年春过世，享年八十岁。

搬家时有件“趣事”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白秀春尽管听取了 my 的劝告，没有招一帮中学红卫兵去“示威”，但却让参与搬家的学生每个人都打扮的精精神神的，每个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而且胸前还佩戴着《东方红公社》的徽章（尽管东方红公社当时已被工、军宣队宣布解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专门让别人看的。而且，在车上白还叮嘱我：宋老师，搬家时你啥也别动，指挥我们搬就成。让他们也知道知道咱宋老师是什么人，谁还敢欺负！我只能不得已的苦笑道：你们也别太张扬了，平平安安就好！从这件所谓的趣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间提倡的诸多行事风格和口号中，诸如：横扫、砸烂狗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有权就有一切……，不仅毒害了一大批自恃出身优越而心存杂念和私心的人们，也使很多心地善良、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的小将们受到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而对这种影响失去警惕，任其发展则是危险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小白的这种安排，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从当时在胡同和院落里看搬家的群体中，我看到除了街坊邻居外，还有街道的干部、积极分子，甚至还有一名穿白制服的派出所民警，但王家自始至终没有一人在院子里观看。从他们异样的眼神中可知，他们对老太太家能得到这么些红卫兵学生的帮助是很难理解的！我自己不自觉的也从中感到某种欣慰，但我也真的深

知，这类做法的负面作用发展下去对小将们的健康成长是有害的。

当我们搬家顺利完成并基本安排下来后，我立即去房管科，一是表示感谢，二是办相关手续。但没想到房管科的人说：根据院里的房管政策，职工和家属不能占用两处住房的规定，你必须与你岳母合住，将原来分给你们的结婚用房交还后，再来办相关手续。同时还拿出相关的材料让我看，表明他没有骗人。对这种预设埋伏的做法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我还是力争了一下。我说：学校的规定当时我不知道，换房时你们也未提及。再说，我们是换房，双方是对等的，当时很明确说的是用我岳母的住房与小奚的316住房换，并未涉及到学校分给我们的住房。而且我岳母的住房面积比小奚的住房面积还多出六、七平米，还有一个独立小院，在换房这点上，学校一点都不吃亏。对此，房管科的人反驳道：你岳母的住房情况我们不十分清楚，但小奚搬过去后，她只有使用权，产权是北京市的，与学校是否吃亏没有关系。我们只能按学校的规定办。因介于有明文规定，我知道再争辩也无益，而且换房在当时是最主要的，吃个哑巴亏也只能认了。因此，事后我们只好退了原来任大本老师费了大力气为我们争来的房子，搬到姥姥那只有六平米的小屋内住，直到去干校离京时为止。■

【述 往】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二）

王复兴

5. 造反派在夺权中分裂

2月8日左右，我听说北大已开始军训，而上海的一月夺权已完成，觉得呆下去没多大意思。于是和大家商量，决定我一个人先回北大了解情况，再决定大家的去向。

2月中上旬我一回到北大，就了解到在北京一月夺权过程中，北京市在造反派内部，发生了尖锐矛盾，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在《红旗》杂志林杰支持下，小圈子抱团夺权，排斥、反对新北大和其他高校。

第一件事是高教部夺权。1月18日，周恩来、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接见首都工矿企业造反派代表，高校红卫兵代表列席会议。周恩来讲“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北京市的一些综合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夺权当中要下大力量”（引自北大《动态报》1月19日）。李清崑告诉我，1月18日周总理布置新北大去夺权的会议，他参加了，确有其事。而后北大校文革成立了“校文革夺权指挥部”。随后，聂元梓在周总理指示下，带领“红旗兵团”等北大学生组织去教育部夺权。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总理当时有个指示，“夺权要在本系统夺”，还说“别的学校都到高教部去了，你们北大的学生也应该去啊。”¹北大学生到高教部夺权时，遇到谭厚兰带领的北师大“井冈山”等高校造反派。北大与北师大对支持高教部那一派夺权

¹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07、208页，第十一章第3节。

发生了分歧。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红卫兵联队”吴传启和《红旗》杂志林杰的支持下，支持教育部“北京延安公社”的卢正义夺权。新北大反对卢正义夺权，因为新北大经调查发现卢正义在历史上曾经叛变自首，并出卖过同志。当时新北大等高校到达高教部后首先夺了权。而后，谭厚兰、卢正义带领几百人反夺权，打了北大学生，发生了冲突。这时关锋、王力打电话给聂元梓、孙蓬一，严厉批评了新北大，明显地拉偏架，选边站。于是聂元梓带领北大学生撤出了教育部的夺权活动。清华“井冈山”到高教部的代表胡宗华请示了蒯大富后，发表了“中立宣言”，也撤出了教育部夺权。

在高教部夺权事件中，新北大的部分人发现：《红旗》的林杰、学部的吴传启、北师大的谭厚兰、高教部的卢正义这一圈人勾的很紧，上面有王力、关锋支持，排他性很强，很不正派。在尔后的北京造反派内部的一次又一次冲突中，上面所说的那个小圈子抢权的现象一再出现，从而引起人们深思。高教部的夺权风波，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北京天派、地派两派分裂的开端。开始时只是新北大与学部、北师大“井冈山”的冲突。

关于周恩来当时是否曾指示聂元梓、新北大去高教部夺权一事。有人质疑。当年聂元梓是指示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李士昆二人带队去的高教部。2016年4月29日，李士昆在北京向笔者回忆、讲述了当年的情况。他说：“1967年1月，聂元梓找我和赵建文，传达周总理指示：现在文革发展到夺权阶段，北大、清华要起带头作用，按系统夺权，去高教部夺权。聂元梓要我和赵建文带队去高教部。”李士昆是此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的记忆当然很重要。

（新北大师生去高教部夺权，不能因为有周恩来的指示，其性质就变成是正确的。其性质仍然是响应、执行了毛泽东进行夺权斗争的极左错误。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无论周恩来在文革中内心是怎么想的，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政治路线方面，他始终是选择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第二件事是1月15日中央统战部机密档案室被抢事件。学部民族研究所的洪涛和统战

部的刘郢把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抢劫一空。民族学院郑仲兵为首的“抗大公社”及统战部的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周总理听取此事的汇报后，指出此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指示要“追回档案”。令人意外的是，公安部第二天把洪涛、刘郢放了，谢富治以“公安部负责人”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讲话，说“革命左派接管档案”是“革命行动”。此“1.15”事件后，统战部和民族委员会系统分成二派，一派是民委洪涛的“红色联络站”和民院的“东方红”，他们得到学部吴传启的支持。另一派主要是民院“抗大公社”的郑仲兵。郑仲兵到北大找聂元梓串联，交流对北京形势的看法，得到聂元梓坚决支持。此后民院“抗大公社”与“新北大公社”成为坚定战友，他们对谢富治都存在不满。

第三件事是1月份两派在中宣部的争执。在陶铸被打倒后，北京市各高校及中直机关各造反组织在中宣部联合批陶，组织了“批陶联络站”。在讨论教育部卢正义所属的“延安公社”能否加入时，发生了分歧，林杰、吴传启、谭厚兰支持卢正义、“延安公社”加入，新北大坚决反对。林杰与新北大“红旗兵团”的代表聂向前（西语系学生）拍桌子大吵。聂向前对林杰说“凭你林杰的权威也不能把卢正义拉进来！”以前屡次显现的那个面貌极左的联盟，再次出来表演，特别之处是第一线后台林杰此次站到了前台。他们那个小圈子联盟，结党营私，到处伸手夺权，排斥异己，并且开始了对持不同意见的聂元梓、新北大、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等，极力进行打击。

当时从许多“耳语”得知，谭厚兰从北师大毕业后分配到《红旗》工作，与林杰同事，后来谭又回到北师大工作。关锋与林杰也曾是《红旗》同事。关锋与吴传启曾同时在学部哲学所工作过。谭厚兰的后台应是林杰。我当时已怀疑林杰的后台是关锋，但不敢说。认为他们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一股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力量。聂元梓、孙蓬一则看的更深入，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已认定王力、关锋是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搞的是一条极左路线。

聂元梓组织了一个直接隶属于她的“除隐患战斗队”，队长是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任务是在极左派里挖叛徒、反革命，整理材料，向中央汇报，此即“除隐患”。“除隐患”

战斗队在1967年上半年曾先后调查、整理过45份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和周总理，绝大部分材料是关于卢正义、潘梓年、吴传启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2015年4月29日我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向赵建文询问了“除隐患”战斗队文革时期反王、关、戚的情况。他说，开始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没有王、关、戚。67年1月在高教部夺权时发现了卢正义的问题，他是叛徒，写过自首书，而且确实出卖过同志。但奇怪的是，吴传启、林杰、关锋、王力不遗余力地支持卢正义夺权。因此开始调查吴传启一伙人的问题。67年春天筹建北京市革委会，戚本禹把许多学部吴传启那一派的人塞进市革委会里，如周景芳（后成为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林杰的妻子王乃英、关锋的妻子周英等。吴传启担任了《北京日报》顾问。他们那伙人一方面指使地派要打倒几个副总理，另一方面拚命抓权，想要控制北京市革委会。于是“除隐患”抓紧了对吴传启等人的调查。当时，学部吴传启的对立面把吴传启“学部红卫兵联队”的一个头头王恩宇给抓起来了。“除隐患”的赵建文等人联系了学部吴传启的对立面之后，去学部提审了王恩宇。王恩宇交待了大量戚本禹的材料，同时表示戚本禹上面有人支持，暗示是康生。此次调查使赵建文、聂元梓确定了戚本禹与王力、关锋是一伙的，但由于涉及到康生，风险太大，就不敢往下查了。不久，聂元梓让“除隐患”战斗队解散。¹

有鉴于北京在一月夺权中发生的三件事，我想在上海的战友们应赶紧回北大。于是在2月下旬使用校文革带扩音器的电话热线与驻上海联络站通电话。当时校文革常委候汉青给我接通了开放式电话，并站在我旁边，我对在上海的“红梅”的六人和扬子浪、黄虹坚说，“赶紧回北大，有新情况。”问我“什么新情况？”我说“有人反对新北大，林杰有问题。”回复“好，尽快回北大。”俞政回来后对我说，“你说林杰有问题，吓了我一跳，赶紧回北京吧，看看怎么回事。”

6. 历史系的一场小风波

¹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第十二章第八节，第242页。

我2月中旬回到北大，历史系出去串联的绝大部分同学已返校，开始军训。当时军训团正协助校文革酝酿合并校内的几个红卫兵组织，建立统一的红卫兵组织“新北大公社”。这时在历史系38楼的楼道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不能允许王复兴加入红卫兵组织“新北大公社”，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贴这张大字报的是一年级考古班的肖润云。他是反校文革“主义兵”的，贫下中农出身。我心想，他可能因为站错队，校文革又不搞血统论，怕自己进不了“新北大公社”，因此通过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用“出身好”、“自来红”来争取加入“公社”。

四年级考古班“红旗兵团”“红色清道夫”战斗队的彭浩看不下去，打抱不平，也贴了张大字报反驳肖润云，说王复兴是“红旗兵团”“红梅”战斗队的，在运动中表现优秀，最有资格加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我一回到38楼就听说了此事，看到了彭浩为我打抱不平的大字报，想起肖润云曾在66年8月随张某闯进我的宿舍，勒令我不许出去串联。心想，这是个小谭立夫，是跟在高干子弟屁股后面跑的“小吹辈儿”。凭着出身想压我，没门，得反击一下。这时历史系“红梅”的4人已回北大。我和徐森商量，要反击一下“主义兵”的挑衅，批一下他们一年级的头头张某，徐森赞同。于是在楼道里贴了一张针对张某的大字报。我当时这么做，有一种报复心理。（张文虎当时不同意针对同学贴大字报，几十年后告诉我，他私下去找张某道了歉。）我和肖润云不在一个班，平时无任何来往，也没说过话，从无过节。但他后来又多次向我发难，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估计是受血统论影响，有着以“出身”来为自身争取利益及社会地位的强烈冲动，于是老拿我当“靶子”，以损人来利己。

1968年秋工宣队进校后，有一天在阶梯教室开全系大会，快散会时，肖润云突然站起来说，“大家注意，我揭发一件事，王复兴是从美国回来的。”过了几天，在一年级全体学生开会时，肖润云又指着我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似乎这是我极大的历史污点。我马上对他高声喝斥“你少和我来谭立夫那套！”他跳起来指责我，但我不再搭理他，说他一句足够了。1970年毕业前，肖因桃色新闻把自己搞的挺没面子。他追求一个同班女生（高

干子女、校田径队员），人家女生不愿意，他一天到晚缠着人家，强求相好。他的“出身优势”没起作用。后来二年级男同学几次出面警告他，让他不许骚扰那名女生，他才不得不罢手，在全系闹的挺热闹。

王渊涛几十年后问我，为什么当年对从美国回来的这件事不解释一下（意思是那是一段爱国的家史）。我有什么好解释的，能解释这件事，却解释不了父亲57年的事，虽然父亲在62年已被摘了帽，但那时管父亲这种人叫“摘帽右派”，颜色还是黑的，反正摘不掉“黑五类”家庭的帽子，何必越描越黑呢。管他别人怎么说，走自己的路就是了。

1967年2月15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红旗兵团”、“东风兵团”、“北京公社”、“红教工兵团”等几个组织合并，以“红旗兵团”为主体，几个组织的全体成员成为“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当然成员。我摘掉了“新北大红旗兵团”的袖章，换上了“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袖章。“公社”总部成员有孙月才、卢平、刘冲、李长啸、夏剑豸。

1967年2月22日，首都红代会成立，全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新北大公社加入。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形式上统一。核心组成员有5人，组长聂元梓，副组长：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8月时，聂元梓派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云龙做她和“新北大公社”的代表，常驻首都红代会。

7. 对文革的困惑

1967年2月18日，军训团撤走，“复课闹革命”泡汤，文革结束无望。大约在2月底的一天，徐森和我吃完晚饭后，在校园漫步闲谈，他突然对我说，“现在到处‘兵荒马乱’，国家成什么样子了！现在人们是敢怒不敢言。”听他这么讲，我一惊，赶紧说“你可千万别到处乱说，千万！”心想，他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传出去可不得了，一准打个“现行”（现行反革命），没个跑。同样的话，他对张文虎、俞政、王渊涛也说了。

他可能是太憋闷，不吐不快。但他也就敢对几个哥们儿、死党讲讲，知道不会出卖他。当时面对一月风暴后的乱局，我们几人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不理解，但谁也不会讲出来，而是要求自己努力去理解，不理解也得紧跟。

大约也是2月底，听说聂元梓要解散校文革，她本人则要辞掉校文革主任一职。这事还真有。过了二天，聂元梓召开了校文革常委及公社总部、各系战斗团团长联席会议，提出，文革发展到现阶段，她本人及校文革已无水平、无能力领导北大的运动，提议解散校文革，她本人辞职。结果遭到一致强烈反对，否决了她的提议。（看来，聂元梓经过一月夺权后，对文革开始不理解，有了看法。但她欲罢不能，于是开始抵制，这和她后来反王、关、戚是一脉相承的。）

聂元梓本人在《口述自传》中说，“到了夺权阶段”“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怀疑以后，我就产生了退下来的想法。”她关于解散校文革和辞职的提议被否决后，一直没死心。1967年6月5日陈伯达针对北大的讲话，引起北大分裂，再次大乱之后，聂元梓于7月，在校文革常委会范围内，提出要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报告要解散校文革、并辞去主任职。但遭到常委们反对而作罢。8月，全国形势大乱，各地发生反军浪潮，运动严重失控。聂元梓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接见会上，周恩来、江青在场，聂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辞去校文革主任一职”，结果马上召到江青的否决和训斥。聂元梓只好取消退下来的计划。¹

聂元梓多次想要解散北大校文革并辞职，她是怎么想的？她在给北京中院的“上诉状”中披露了她的“活思想”，她写道“我对文化大革命这么搞法不理解，这局面怎么收拾？”“原来以为军训后，解放干部，学生复课，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了。可这样子越来越糟了。我干不了。”²但她的提议，群众不同意，中央不接受，她是“欲罢不能”、“骑虎难下”。于是她自然地对运动采取了抵制的立场和态度。

¹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426页，第十七章“我的上诉状”。

² 同上，428页。

8. 郭罗基的大字报

一月夺权风暴之后，中央文革、《人民日报》频频号召掌了权的群众组织头头，要开展整风，夺头脑中“私”字的权，清除各种不良之风。

3月3日，郭罗基（哲学系教师、国际饭店会议挨整的老“左派”、原“红旗兵团”骨干）在大饭厅外墙贴出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立即引起轰动，围观者众。郭的大字报批评聂骄傲自满、文过饰非、官僚作风。说江青批评北大运动搞的“温”，聂元梓有重大责任。批评校文革没有充分依靠从学生中涌现的闯将。要求聂元梓带头整风。看得出郭的大字报出自善意，但用语尖刻。随后出现许多支持郭罗基的大字报。3月5日，扬子浪贴出支持郭的大字报。但也有些“新北大公社”的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反对郭罗基，说他是“针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是“逆流”。聂元梓没有制止这种压制批评的现象。群众的争论逐渐激烈。这张大字报及尔后校文革展开的整风，引起了各种思想的交锋，为6月北大的重新分裂埋下了又一条伏线。

3月6日左右，化学系“新北大公社”“0363”战斗队（队长陈醒迈）贴出海报，倡议校文革开门整风，并在大饭厅多次召开大型串联会，设讲坛，批评校文革，给聂、孙提意见。

3月8日，校文革应群众要求，开门整风，孙蓬一讲话，他自我批评少，为校文革辩解多。令我很不满意。

3月9日中午，扬子浪再次贴出整风大字报《反老孙论 献给“反杜林论”的拙劣宣传者孙蓬一》，大字报对孙蓬一对待整风的态度，做了尖锐批评，劝告他“退一步，进二步”。从中午到夜晚，观看此大字报的人群络绎不绝。我挺欣赏这份大字报。但“红梅”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因为觉得局势复杂，同样是整风，但有“拆台”和“补台”两种立场。需警惕校内外反北大的极左势力借机起事。

3月10日前，校文革第二次开门整风，聂、孙做了第二次自我批评，大部分人对他们的检查不满意，出现很多批评他们的大字报。

3月10日，校文革常委徐运朴、候汉青贴出大字报，对聂、孙提出批评，批评他们整风不够虚心，缺乏诚意。

化学系0363战斗队、陈醒迈，不断召开整风鸣放串联大会，批评校文革和聂、孙，不让过关，我感觉有点揪住不放的意思。而0363的串联大会每次开完后，新北大公社中都有一批被我们称之为“死保派”的战斗队（如历史系“桔子洲”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压制提意见，批评“0363“等提意见者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打击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反校文革逆流”。对0363及其支持者压服的结果，是越压越不服，他们对聂、孙的批评，调门越升越高。我们“红梅”有被夹在中间的感觉，对两个极端的态度都不满意，一方面不赞成0363不断上纲上线；另一方面不赞成“桔子洲”们压制批评，堵塞言路，认为这是为校文革帮倒忙。感到双方都把人民内部问题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方向扯，头脑太热，不理性。

3月下旬，中文系马西沙为“红梅”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夺取政权，保卫政权，巩固政权，发展政权》，论述了反党委、反工作组的夺权过程；论述了击溃“井”、“红”从极左方面攻击校文革、巩固红色政权的意义；而后重点论述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夺权掌权之后，应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需要通过整风来“完善”和“发展”政权；批评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强调对校文革要补台。大字报贴在大饭厅前大字报苇席栏上，大字报很长，从北至南贴了很长一排。从早至晚，观看者众。公社总部刘冲见到我，说“红梅这张大字报写的好，现在缺少正面的批评、引导。”

北大3月的整风波浪，使“新北大公社”出现了一些裂缝，到了6月5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看准了裂缝，蓄意投下一颗巨石，要把他所说的北大“一潭死水”，掀起“大风大浪”。从而造成北大的大分裂。整风中的反对派郭罗基、徐运朴、候汉青、孔繁、杨克明、0363战斗队、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等都分裂了出去，成为反校文革派，并与

1966年底被击垮、1967年5、6月死灰复燃的部分“井”、“红”骨干和个别人如牛辉林，合流。而支持校文革的一派，也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压制给校文革提意见的死保派“联战”；一派是“66串联会”，“66”支持校文革，坚持批判校内外的极左思潮，支持聂、孙对吴传启的斗争，但同时继续严肃批评聂、孙的错误，坚持校文革必须继续整风。

9. 孙蓬一 4·12 演讲

1967年4月12日晚，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北大大饭厅召集全校师生，发表了一个在北大及全北京市影响极大的演说。这个演说代表了新北大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也代表了后来人们所说的北京天派中的新北大派，向后来所说的地派中最左的“学部联队”吴传启及其后台这一派宣战，不点名地向极左派的代表人物王、关、戚宣战，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地院东方红。这个演讲引发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引发了新北大“炮打谢富治”；二是导致了陈伯达于6月5日下重手“修理”新北大和聂元梓。

孙蓬一“4·12”演讲的直接导火索是“4.8民族宫事件”及紧接其后的“4.11”地院“东方红”等六校冲击北大事件。下面从“4.8”到“4.11”，再到“4·12”，按顺序做个回顾。

关于“4.8”民族宫事件：4月初时，民族宫有个民族工作展览，造反派要对展览的修正主义民族路线进行批判。当时民委系统两派争夺对展览会的批判权。一派是民研所洪涛、刘郢的“东方红”。学部吴传启、地院“东方红”支持这一派。另一派是民研所“二·七兵团”及民院郑仲兵的“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等19个单位支持这一派。地院“东方红”这一派排斥新北大这一派，要求“二·七兵团”和民院“抗大公社”退出批判展览会的联络委员会。新北大坚决反对。7、8号时，“新北大公社”的学生进入了展览大楼，占据了部分房间和材料。“红梅”的徐森及我们班女生杨桂香在其中。8号，地院“东方红”公开讲要把北大等单位的人从民委大楼赶走。“新北大公社”总部卢平，紧急带领“公社”

数力系学生 50 人赶至民族宫进驻，好友扬子浪也在其中。

4月8日下午5:00，地院“东方红”等地派院校学生包围了民族宫，9日凌晨二点，地院“东方红”等发动夜袭，200多人冲进大楼，把北大同学住的房间玻璃打碎，进入房间抢材料，把北大学生推出屋外，一间房一间房清户，逐个人推出大楼。他们对北大学生喊道：“你们是保守组织，无权批判展览会。”扬子浪在其公开发表的《文革日记》中记述了“4.8事件”，写道“地院‘东方红’等校红卫兵”“他们砸玻璃门窗，大打出手，无所不用其极”，“终于在凌晨3时左右占领了全部房间，抢走了全部材料。”“今晨6时回校”“挨了打，受气，丢了材料。”“洪涛、吴传启、卢正义、徐非光他妈的处处与北大为敌，绝无好下场。”¹

扬子浪这天日记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是被动挨打被赶走，憋了一肚子气，斯文如扬子浪者，也忍不住在日记中来了句“国骂”。温度骤然升高了。二是扬子浪明确意识到真正的对立面不是“大打出手”的地院“东方红”，而是站在他们后面的吴传启（学部）、洪涛（学部民研所）、卢正义（高教部）等，是这股势力。吴传启的背后是谁？扬子浪可能为着安全，没有写出来。但我们当时一起议论的是，地院后面是林杰，林杰后面有后台，可能是关锋？（对关锋我们只敢怀疑）。地院“东方红”是被人当枪使，但因有所仗持，因而胆子大，行动野。

紧接着发生了“4.11冲击北大事件”：4月11日下午三点左右，地院“东方红”等六所大学的宣传车，闯入北大校园。除地院外，还有邮电学院、农机学院、工大、农大、民院的群众组织。他们继“4.8民族宫事件”后，不肯罢手，继续挑事，主动攻击新北大。他们六辆宣传车开入北大，车上大喇叭广播：“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新北大公社是新保守派！”、“揪出聂元梓的后台！”等。大喇叭的吵声把北大学生都引到楼外校园的马路旁。北大学生把六辆车团团围住。

¹ 扬子浪：《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刊于《记忆》132期，2015年6月15日。

我当时在场，心里直冒火，他妈的，敢到北大来撒野！于是一跃一攀，我带头首先登上了地院那辆车。二话不说，把连着大喇叭的电线扯了下来，宣传车顿时变哑吧了，北大学生欢呼雷动。有样学样，有些同学登上了其他车，纷纷拔掉电线，六辆车都哑吧了。北大无人动手打人。这时校广播台广播：“北大同学注意，不要动手打外校学生。欢迎外校学生给北大校文革提意见。外校同学这样来北大闹事是不对的。请外校学生离开北大。北大同学把校门打开，让他们出去！”晚6时左右，胡宗式（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负责校外活动）带着许多人把六辆车推出了校门。地院等校的宣传车离开了，但北大师生激愤难平。接着便发生了孙蓬一的演讲。

关于“4·12孙蓬一演讲”：孙蓬一演讲的直接导火线，就是“4.8”和“4.11”两个接连发生的事件。4月12日晚8:30左右，孙蓬一（校文革副主任）在大饭厅招集全校师生大会。大饭厅被挤的水泄不通，人头涌动，红旗招展。孙蓬一登台演讲，慷慨激扬，话语流畅，铿锵有力，不时被几千人的欢呼打断，持续约一个半小时。

下面摘录孙蓬一“4·12演讲”的关键话语——

“昨天、今天，我们新北大上上下下，一切革命同志，万众一心，斗志昂扬的气概就可以给企图搞垮新北大那些人一记响亮耳光！”“我们绝不想干涉兄弟单位内部的事情，但是你们既然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一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据我们所知，现正充当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充当一个反我们新北大公社红色革命政权的打手的急先锋们就是朱成昭的势力、朱成昭的残余的力量。”“他们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为了独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就不惜破坏大联合。”

“目前的这场斗争，既然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无产阶级江山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因此什么‘委曲求全’呀，什么‘忍辱负重’呀，让其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只能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

“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

“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他们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真正的‘摘桃派’”“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他们里面查明了叛徒，起码有五个。”“例如卢正义。”¹

对于当年孙蓬一敢于冒着巨大风险，带领我们“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坚决反吴传启，反王关威，反极左思潮，保周，我始终由衷地敬佩，并认为历史应对孙蓬一的英雄行为给予正确的评价。但对他的缺点、错误，我也同样认为不能回避。

4月13日，谢富治在人大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解决“4.11”北大与地院的冲突。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胡宗式参加了会议。在接见会上，谢富治表面公允，不让北大和地院讲话，却让随地院到北大闹事的其他五个院校发言，结果北大成了挨批对象，被诬指“挑起武斗”。这明显不公平且颠倒是非。谢富治甚至单独对聂元梓讲“武斗是北大挑起来的。”消息传出来，北大师生议论纷纷，明明是地院等六校跑到北大校园闹事，并不是北大去了地院啊。怎么把责任推到北大头上？再说，北大也没人动手打人呀。那有这么不顾是非，拉偏架，选边站，偏帮地院的呀。这不是拉一派打一派嘛！

13号晚北大学生聚集在大饭厅，孙蓬一发表了即席讲话，说谢富治处理不公正。许多北大学生对谢不满，许多人自动跑到市内贴大标语“炮轰谢富治！”等。还有一批人去公安部要和谢富治“讲理”。聂元梓听说后，赶紧派人去盖掉前面人贴的谢富治的标语（难免有漏掉的），同时派人去公安部把找谢富治“讲理”的学生拦住，劝回学校。这就是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第一次炮打谢富治的情景。当时“红梅”没动，觉得当时公开炮打谢富治太不策略，北京市革委会马上就要成立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已任命谢为市革委会主任。4

¹ 孙的“4·12”演讲，全文刊登在4月13日《新北大》校刊。这个讲话点了吴传启的名，并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句话的矛头就是指向了王关威。这个讲话对了解北大1967年的历史及当时北京的两派斗争十分重要。故以上做了较多的摘录。

月13日下午，聂元梓、孙蓬一在小范围议论，“看来谢富治和王、关、戚是一伙的。”¹

过了几天我回家，在北京景山学校当英语老师的王瑞和几个弟妹告诉我，前门城楼上有大标语“新北大岿然不动”，大街上还有新北大贴的“谢富治算老几？”、“打倒谢富治！”、“炮轰谢富治！”，问我怎么回事？可见“4·12”、“4.13”事件动静之大。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宣告成立。主任：谢富治，四个副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

10、反极左，反吴传启

5月时，“红梅”在“新北大公社”中经常和几个战斗队及好友进行交流，有“横扫千军”（跨系）、“东方红”（中文系）、“0763”（中文系）、“红色清道夫”（历史系）等，另外有些个人如任瑚琏（中文系）、孟关霖（物理系）、李长啸（经济系）等。当时大家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认为主要危险是极左路线及极左思潮。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第一线人物是“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吴传启，第二线人物是林杰，第三线人物是林杰的后台（怀疑关锋）。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的思想偏左，被极左派当枪使了。我们斗争纲领就是反极左，斗争策略就是先打吴传启。吴传启是他们的一个敏感枢纽，也是他们的弱点。一打吴传启，那个极左阵营的上下前后都震动，都有反应。

从3月开始，北京市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些高等院校如农大、农机、人大、北外、石油学院等学校的一些组织（后来被称为地派），提出了打倒几个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的口号，出现了揪斗几个副总理的风潮。与之对立，另外一些高校组织（后来被称为天派）则只“炮轰”，不“打倒”。“新北大公社”支持“炮轰”派，反对“打倒”。我们几个战斗队当时认为，要打倒几个副总理的风潮，是“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其要害是要打倒周总理。如果把周恩来的所有助手都打倒了，周恩来怎能独

¹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十二章第1节，第223页。

善其身？而总理如果倒了，国将不国，陷入深渊。因此必须保周，这是我们的又一个纲领。当时从地派流传出一个理论，说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所谓旧政府就是几位副总理，总后台是周恩来，代表了旧的国家机器，应该砸烂，由新文革取而代之。我们认为这是典型的极左思潮，对文革、对国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必须与之划清界线并坚决斗争。

6月1日，“除隐患”战斗队用大字报公布了第一批吴传启的资料，把北京反吴传启的斗争引向深入。

“除隐患”战斗队的队长是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这个战斗队直属聂元梓领导，任务是调查北京的那些形左实右的代表人物，调查他们怎样破坏文革，调查他们的历史，挖叛徒。他们是秘密部队，是一支精干的调查队伍，向中央文革和周恩来递交调查报告。那时我和索世晖经常与赵建文见面聊天，赵的嘴挺严，什么也不透露。

后来得知，在5月时，聂元梓、孙蓬一、赵建文已认定“隐患”就是吴传启及其后台王、关、戚。他们已向中央递交了潘梓年、吴传启、卢正义、洪涛等人的材料。向上递交的材料到吴传启为止，更大人物的材料没敢整理、上呈。而我们“红梅”战斗队做为群众当时只认定了吴传启、林杰是“隐患”，往上只怀疑到关锋为止，再往上就不敢想了。

我曾于2016年5月2日拜访赵建文，询问他在1967年9月1日王力、关锋倒台前，“除隐患”战斗队整理并向中央上报的材料中，有没有吴传启以上极左派大人物的材料？他明确告诉我，没有上报过王、关、戚的材料，但整理和上报了谢富治的材料，包括他在市革委会重用周景方那帮人，结党营私的材料。

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北航“红旗”韩爱晶在2月至4月这段时间对“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等反学部吴传启、洪涛，是持观望态度。到了5月，老蒯、韩爱晶也加入到攻打吴传启的行动。其实后来人们所谓的“天派”、“地派”并不是阵线很清楚的两派，地院“东方红”王大宾只是左了一些，被人当枪使了。

真正对立的两派，一派是“学部”、一派是“新北大”（当时普遍的口头叫法）。“学

部”这派有吴传启控制的学部“红卫兵联队”、洪涛控制的民研所“红色联络站”、卢正义控制的教育部“延安公社”、谭厚兰控制的“北京师大井冈山”。他们听命于《红旗》的林杰。这个圈子的行动相当一致，口号、行动都很左，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到处伸手抢权。一旦有什么冲突，王、关、戚便以中央文革名义出面支持他们。

新北大这派有：北大校文革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人民日报“井冈山”和王若水、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阮铭、民族学院“抗大公社”和郑仲兵以及石油学院的“大庆公社”、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公社”、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红鹰兵团”、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公社”等。

这派的共同特点是：反极左，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对谢富治强烈不满，对“二月逆流”的几个副总理“一批二保”，反对打倒。坚决保周（周恩来）。新北大成了反极左、反王、关、戚的中心。新北大得到了军队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派”对立面）的支持，聂元梓与高等军事学院的“红高联”有密切联系。新北大派在5月一发动反学部吴传启的攻势（此时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参加了进来），极左派就全线震动，王、关、戚便被逼到前台施压，施压无效，重量级人物终于出马，陈伯达在6月5日针对北大二次讲话，挑动北大分裂，以阻止新北大反吴传启、反极左。这便是1967年上半年北京两派斗争的全局概况。■

【读者来信】**1. 刘进纠错：魏格林文章中的两处误植**

今年8月有特殊的意义，感谢《记忆》第163期此时刊发的所有文章，尤其是感谢魏格林先生以卞仲耘之死为例的文章。在读魏先生文章时，发现第7页提到的一处日期有误，即：“1990年代初，她根据自己的研究给学校写了一份报告。（注释1：本刊特约记者：面对历史的责任。刘进访谈录，《记忆》2012年第80期，第16-18页）。”刘进给学校提供报告的年份应该是2010年。查《记忆》第80期第16-18页，没有提到调查文章一事，只是在第19页提到2010年给学校交了调查报告。所以魏先生文章应该有两处更正，一是把“1990年代初”改为“2010年”，二是把注释1的“16-18页”改为“16-19页”。因没有及时查核注解原文，所以拖至今日才提出，望见谅。■

2. 张晓良纠错

171期，65页倒数5行，王怀份（念bin），“份”疑是“玢”（bin），
76页正文倒数9行，“察，”之前疑有漏字。■

3. 北京四中校友致信王复兴，谈其《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一文**曹小平致王复兴：**

四中这段历史由你写出，真是功德无量。我个人认为这是文革的前奏，山雨欲来风满楼，高干子弟集中的地方首先开始了。

我知道你是优秀的中长跑运动员，于火在网上与我聊天谈到你。我看到你的文章《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写得很好。主要是把四中社教的起因说得很清楚。而且我已把这个要害向我的一些朋友讲了，你抓住了关键点。你写的是事实。但我并不知几个高干子弟向

中央写信之事，圈外之人不得而知。

我不了解外班。我们高三3班挨整的有七、八人之多。工作组进校后把我写反动诗的问题搞清楚了。我对工作组讲了我在北京市打乒乓球的成绩，为四中获西城区中学生单打冠军，为四中夺团体冠军立主功，多次上晚报，还上过一次中国青年报。在新社会，我如鱼得水，只有喜爱，不会不满，否则就不合逻辑了，因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嘛。工作组说你以后还可继续写诗，澄清了我没有问题，这样，我考上了清华，而其他挨整的同学均落榜。五十多年过去，一切真相大白，所有中学，大学同学都是老朋友了，不仅网上群聊，还来了七、八批到温哥华我家来玩。

在1964年的学潮中，有些同学受到迫害是铁的事实，这些同学俱在，这是否认不了的。同班的原同学回忆说整学生是从我们3班开始的。我记得，我班同学赵XX，因出身地主，首当其冲被批，说他与家庭划不清界线。接着批阎XX，他父亲在台湾（八十年代回国定居），并举了一首他写的诗批他，其中有这样句子：“几时有同行女伴的微笑，照亮我灰暗的途程。”批他思想颓废，对社会不满。其实这是他抄的某外国诗人之诗，写在本子上。高知子弟邹XX功课好，被批白专。同学宋X看不过去，在墙上贴了一张小字报《随感》，马上被围攻，说他暑假在北海公园门口卖西瓜，与女孩如何如何。

我与阎都爱好诗词，关系好。某革军子弟等人逼我在阎的问题表态，我不认可他们给阎“对社会不满”的大帽子，于是矛头就转向我。正好我有一首诗在课堂上写的，你还记得高二语文课学曹植的《白马篇》吗？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句。我就顺手写了一首《宝剑行》，给了阎，他放在诗本里，后又给赵看，又听说转到张XX手中。我成天在体校打乒乓球，早忘此事。结果就用此诗批我“扶蒋反共”。后来就整语文老师程铮，整校领导。等工作组来了找我了解情况。我把自已“家庭情况”（机关干部）、本人的情况，尤其是我的运动员（一级）身份，都对工作组讲了。可以讲，我是当时社会的宠儿，怎么会反社会？我们才十六七岁。工作组最后让我继续保持写诗的爱好的，也算是结论，我考上了清华。值得一提的是其他那些同学被整得无人上大学，但阎，邹，孙后来都入了党。我

后来结婚，我的岳父是开国中将，武汉军区副司令。但我并不认同3班某革军子弟等人当年的作法。

我虽很久没回国，但与七、八位同学保持联系。包括今年9月12日的班上聚会都知情。在1965年，几个高干子弟在史XX家组织了二十几人开会（不够我班半数），确定我班一些人不可上大学。此事我们班的原同学比我清楚，是他前年来温哥华时告诉我的。这算不算对同学的迫害呢？

我们回忆历史，并不是为了追究同学个人责任，而是为了厘清真相，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埋葬极左，走向光明与进步。左的思潮很早就开始了，所以文革才会发生，是积累起来的，希望中国永绝文革。■

2016年10月17日

王志光致王复兴：

拜读了大作，对你多年坚持寻求真相、抢救历史的精神十分佩服。

我只记得当年学潮的大致情景，但对其前因后果却不得而知。我曾在回忆高三4班同学的文章中，对当年四中的学潮提到了几处，如：发展团员标准过严、批判程铮老师和毕向明同学、大家在班上都要发言表态、工作组让我毕业后参加党课训练班后跟我谈话，我不知深浅地给工作组提了些意见，就没有达到入党标准等。

我们那时年轻幼稚，充满朝气，也容易冲动，在全国大讲阶级斗争的大气候影响下，很容易受其影响而有一些过激的言行。但事后思考，就会明白事理了。其实，当年大家被迫批判毕向明同学，心里也觉得他没什么事。他说“吃饱了发困，饿了发呆”，这句话本是生理现象，可当时却要当作反动言论批判人家！好在四中对我们人格的正面培养深入内心，使我们大多数毕业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没有犯什么大错，知道什么是做人的底线，众多校友在各行各业也多有建树。这是后话。■

2016年10月20日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辑：梨洲

本期校对：立新

本期版式：华雨